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民主化與台海和平之分析

Democratization and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doi:10.30390/ISC.200408_43(4).0001

問題與研究, 43(4), 2004

Issues & Studies, 43(4), 2004

作者/Author：李西潭(Yeau-Tarn Lee);張孝評(Hsiao-Ping Chang)

頁數/Page：1-3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4/08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408_43\(4\).0001](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408_43(4).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民主化與台海和平之分析*

李 酉 潭

(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教授)

張 孝 評

(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碩士)

摘 要

二十世紀末期，人類政治史上最特殊的現象就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捲全球，使得新興民主國家急遽增加。故當代全球化下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民主化。然而，根據美國「自由之家」最新的統計（二〇〇二～二〇〇三年），我們可以發現：所謂「第三波」全球民主化的進展似乎已經接近尾聲。台灣自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後就一直被列入自由民主國家的行列，且被學者評為民主轉型的典範之一，現在大家的目光焦點正集中在中國是否可能進行「第四波」的民主化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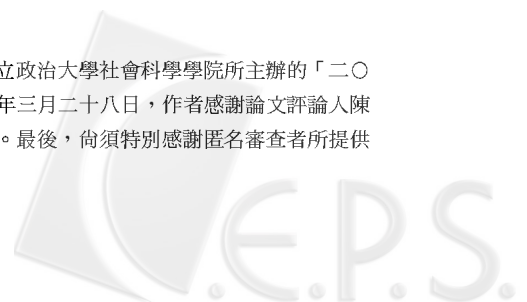
當代社會科學最著名的發現之一就是：「民主國家間從未發生戰爭」。儘管鞏固的民主國家間可能不會相互戰爭，但民主化過程中若發生民主倒退的現象，則會增加戰爭的可能性；雖然民主化過程不必然會導致戰爭，但崎嶇而不穩定的民主轉型會使國際戰爭發生的機率增加。因此，民主化正是兩岸永久和平的關鍵；第四波民主化的浪潮若降臨在中國並順利推動達成民主鞏固，最終的和平才可能普及於全世界。

本文旨在瞭解全球化下的民主化浪潮，辯明民主化與戰爭、和平的關係，分析台灣民主化的經驗，探討中國民主化的可能性，進而思索台海和平的展望。

關鍵詞：民主化、民主轉型、民主鞏固、兩岸關係、和平

* * *

* 本文初稿曾以「全球化、民主化與兩岸未來」為題，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所主辦的「二〇〇三年全球化下的全球治理學術研討會」，台北，民國九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作者感謝論文評論人陳義彥主任，及會後陳文賢、盛杏潑兩位教授所惠賜之寶貴意見。最後，尚須特別感謝匿名審查者所提供的修正建議，唯文中疏漏之處，理當由作者自負。



壹、前言

二十世紀末期，世界上有兩股潮流深刻地影響著我們，一是經濟上的市場化浪潮，二是政治上的民主化浪潮。前者使得國家規模的計劃經濟體系逐漸式微，後者則促使威權統治、軍事體制和個人獨裁政權迅速瓦解；自由民主國家被廣泛地視為是唯一真正具有現代化意義的國家，民主政治也成為人類文明社會的主流象徵。因此，人類政治史上最特殊的現象就是所謂「第三波」(Third Wave)民主化浪潮席捲全球，使得新興民主國家急遽增加。^①而探討民主化的相關研究亦如雨後春筍般大量出現。所以，我們不禁要問：現代的代議民主共和國為何成為唯一可行的合法性政治實體？為何此一脆弱且不周全的制度會成功地取代其他的政體？又為何民主政治的傳播會如此迅速和廣泛？^②

根據美國紐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世界各國自由調查報告(二〇〇二~二〇〇三年)中指出：全球「選舉的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共有121個，「自由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國家計有89個；其中「選舉的民主」國家數目與比例依舊達到很高的水準，而「自由的民主」國家則代表著世界人口43.6%的27億人，但全球卻有將近22億(35.3%)的人民處於不自由的47個國家中。^③其中，

註① Samuel P. Huntington 所謂「第三波」的民主潮流，開始於一九七〇年代中期的南歐，一九八〇年代初期與中期傳佈到拉丁美洲與亞洲一些國家，然後於一九八〇年代晚期與一九九〇年代早期到達東歐、蘇聯與部分非洲國家。它創造了民主的時代，使得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超過半數的國家擁有民主政府的形式。請分別參見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p. 13~26; Samuel P. Huntington, "After Twenty Years: The Future of the Third Wav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8, No. 4 (October 1997), p. 4.

註② 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院士 John Dunn，為著名國際研究民主政治的學者，二〇〇二年四月十二日應佛光人文社會學院之邀，在國立台灣大學發表題為「民主制度為何贏得勝利？」(Why has Democracy won?)的演講中，談到民主勝利的因素時，提出三個思考方向：(一)民主制度賦予統治者正當性的基礎；(二)民主制度最能符合市場經濟的條件；(三)民主制度是由外在強權強加而成的。而最後的總結是：無論從回教神權的角度來否定民主政治的普及性，或從美國強權的角度來證明民主政治的普及性，同樣缺乏說服力；因為欲瞭解民主政治是沒有一個簡單的方式，而且正確的答案亦不在我們手中。

註③ 二〇〇一年底，在192個國家中，有121個(約60%)國家被評為是「選舉的民主」國家；相較於一九八七~一九八八年的調查顯示：在164個國家中，只有66個(約40%)國家可以被列入。換言之，「選舉的民主」國家在過去的十四年當中增加了55個，平均一年約有4個國家進入「選舉的民主」國家之列。2002年底，「選舉的民主」國家仍舊在全球192個國家中維持121個(比例為63%)。分別見 Adrian Karatnycky, "Muslim Countries and the Democracy Gap,"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3, No. 1 (January 2002), pp. 99~101; Adrian Karatnycky, "The 30th Anniversary Freedom House Survey: Liberty's Advances in a Troubled World,"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January 2003), pp. 105~108.

中國不但被評為不自由的國家，^④且約 12 億的人幾乎就佔了不自由國家總人數的二分之一強（54.5%）。因此，中國是否可能在未來進行所謂「第四波」的民主化，將是全世界矚目的焦點。^⑤此外，民主化的傳播是否意味著免於戰爭的恐懼？二〇〇二年八月陳水扁總統在參加「亞太民主合作論壇」時表示：亞太地區的安全與穩定、民主鞏固與擴大以及經濟合作與發展，此安全、民主和經濟，可說是確保亞太地區和平與繁榮三個主要的「錨」。^⑥其中，民主的擴大與鞏固，才是真正能夠促進亞洲的和平與發展，並成為全球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穩定基石。^⑦台灣作為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典範，應與先進民主國家攜手合作，針對鞏固東亞新興民主以及促進亞洲地區的和平努力，尤其是對於中國的民主做出貢獻。因為民主化所致力於實現的是自由民主，這種民主建立在人民自願同意的基礎上，而非建立在暴力的基礎上。所以，民主化正是兩岸永久和平的關鍵因素。

本文首先欲瞭解全球化下的民主化浪潮進展情形，再進一步思索民主、民主化、戰爭與和平的關聯性。其次，分析台灣民主化的過程與經驗，以及台灣被列入全球第三波民主轉型典範的成就。另外，探討中國進行民主化的可能性，並觀察台灣民主化的模式，能否成為彼岸中國政治領導者的借鏡。最後，則說明是否唯有民主化進展順利才能確保台海永久的和平與繁榮。

貳、全球化下的民主化浪潮

當我們在探討如何整合民主化浪潮的議題時，將發現這種擴及全世界的政治運動、形式與影響，都可能和全球化的進展有相當程度的關聯。因此，全球化的意涵是什麼？由於認知角度的不同，論者對全球化的立場也迥然而異。基本上可以區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把全球化本身作為研究的對象；另一類則是將全球化作為研究具體問題的重要參照背景，討論背景與對象間的互動關係。前者是嚴格意義上的全球化理論；後者則是廣義上的全球化理論。根據嚴格意義的標準劃分，現有的西方全球化理論可歸納成三個學派：（一）極端全球主義論者（hyperglobalists）、（二）懷疑論者（sceptics）、

註④ 二〇〇二年中國自由程度在公民自由方面的等級為“6”；在政治權利方面則是“7”，屬於不自由的國家。參見 Karatnycky, *op. cit.*, p. 106.

註⑤ 參考 Larry Diamond, “The End of the Third Wave and the Start of the Fourth,” in Marc F. Plattner and Joao Carlos Espada, eds., *The Democratic Invention* (Baltimore, M. 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7~28.

註⑥ 在亞洲民主國家間形成安全合作機制，已經成為亞太區域的民主趨勢之一；這類機制可以化解區域內不穩定因素；因為民主意識接近的國家，較能在邊界安全、打擊恐怖主義議題上成功合作。參閱中國時報，民國 91 年 8 月 27 日，版 13。

註⑦ 民主化能為東亞地區作什麼？有學者認為：民主化可以整合整個東亞地區，並據以作為東亞和平與安全的堡壘。參考 Hilton L. Root, “What Democracy Can Do for East Asia,”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3, No. 1 (January 2002), p. 125.

(三) 轉型主義論者 (transformationalists)。^⑧不論是由概念的意義或事實真相的探索，學者們仍對全球化的議題彼此爭論不休。若未謹慎地加以界定，此一詞彙將會在無所不包地統攝一切事物之際，卻也同樣地陷入無法解釋任何事物的窘境。^⑨故吾人將採取廣義範圍的解釋與定位，亦即視全球化為研究民主化問題的時代背景資料，來討論全球化趨勢與民主化浪潮間的重要性與關聯性。

一、全球化 vs. 民主化

二十世紀末期與二十一世紀初期，有兩大國際思潮受到世界的矚目：全球化與民主化。當代全球化的趨勢告訴我們：人類政治史是一個不斷民主化的過程；民主化消除暴力與野蠻性，弭平階級與不平等。全球化做為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的重要階段，能否為民主化的實現條件奠定基礎？對於當代全球化的民主化看法可以歸納出三種設想：(一) 自由國際主義 (liberal-internationalism)、(二) 激進共和主義 (radical republicanism)、(三) 世界主義民主 (cosmopolitan democracy)。^⑩它們分別從不同的出發點來探究全球化的政治前景。倘若將焦點放在前述廣義的準則來看，亦即以全球化作為一種擴及世界的效應，幾乎沒有任何社會生活領域能免於全球化過程的影響，將有助於釐清全球化與民主化間的關係，並有利於解釋第三波民主化理念的擴散情況。首先，在全球化與民主化的互動關係方面，有學者認為：雖然全球化與民主化都有悠久而複雜的歷史，但是這兩股思潮相互聯繫且更重要的是彼此強化。也就是說：全球

註^⑧ 極端全球主義論者強調：經濟全球化導致國家權威的衰弱，甚至民族國家在內的各種制度中將失去存在的基礎，市場成為決定和解決所有問題的唯一力量。而懷疑論者則認為：所謂的全球化實際上只是國際化，國家依然是經濟的主要管理者，全球主義宣揚的國家終結觀點不但過於天真，而且帶有強烈的意識型態偏見。至於轉型主義論者的主張乃是：把全球化視為一個社會變革的過程，因此強調全球化確實是使社會、政治、經濟等產生變化的動能，但這種變動的方向是不確定的，在不斷變化的世界秩序下，各國政府必須對國家的形式和功能進行調整。參見 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David Glo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Oxford: Polity Press, 1999), pp. 2~12.

註^⑨ 參見 Todd Landman, *Issues and Method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220. 另外，在現在有關於全球化的討論中，存在著五個迷思：(一) 全球化等同於自由化、(二) 全球化不可避免、(三) 全球化將在經濟各領域均衡發展、(四) 全球化將扼殺民主主義、(五) 全球化對於任何一個人都是一件好事 (或壞事)。參閱讀賣新聞 (日本)，1998年11月2日。

註^⑩ 自由國際主義強調改革現有的全球治理結構，其思維隱含政治必然趨向全球民主化的假設；基進主義強調的是依據共和主義原則創造替代全球社會、經濟和政治組織機制，並透過新社會運動在全球民主化中發揮關鍵的作用；世界主義民主則堅信將民主考慮為一種雙重過程，所謂的雙重指的不僅是國家共同體中的民主深化，而且還指涉民主型態和過程的擴大到領土邊界之外。參見 Held, McGrew, Glodblatt, and Perraton, *op. cit.*, pp. 447~450.

化助長民主化，民主化助長全球化。^⑩若世界趨勢由單一意識形態所主導，相較於世界被不同的意識形態區隔成敵對陣營（如同冷戰時期所展現的兩極化狀況——美、蘇意識型態的對抗），似乎較有利於全球化的擴散。而且自由民主明顯地助長全球化的經濟規則——市場經濟和開放的國際貿易系統；自由民主對於個人權利和知識取得的重視，促進並增強全球化的資訊流通。毫無意外地，那些想要試圖限制其人民接觸國際網路的國家，幾乎皆是非民主的，因為全球化可藉由揭露不同的生活方式與政權態樣予其人民知曉，進而削弱威權專制的勢力空間，並使得其社會變得更加公開、彈性與透明。^⑪所以，至少在短期內，全球化對民主化應該是有利的；全球化與民主化傳播之間，是可以相互加強的。在全球化的時代重新考慮民主：如果民主制度仍想在今後幾個世紀裡保持其相關性、有效性和合法性，進一步解決國家之內和國與國之間如何深化和擴展民主的問題，乃是至關重要的。^⑫

二、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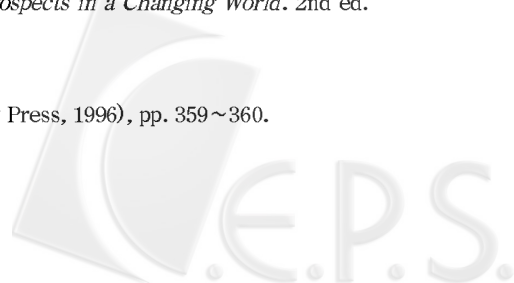
在全球化效應的感染下，民主化運動是否形成一種擴散趨勢？新興自由的民主國家增加程度如何？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第三波**（*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書中表示：民主政治在世界範圍內的進程呈現出三次浪潮。十九世紀初到二十世紀三〇年代歷經第一次民主化的長波。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主曾大規模的散播，一九二二年全球約有三十二個自由民主國家，但是由於法西斯主義的崛起，使得二十年後僅有十二個保存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了第二波民主化的浪潮，此次短波只在五〇年代達到了顛峰，直至一九七〇年代才逐漸偃旗息鼓。當今世界則正在經歷第三波民主擴展的浪潮。^⑬以下

註⑩ Marc F. Plattner, "Globalization and Self-Government," *Journal and Democracy*, Vol. 13, No. 3 (July 2002), p. 54. 儘管如本文所述，全球化對民主化有相當正面的作用，但未來發展的模式卻未必一定如此，即全球化可能為民主化帶來威脅。例如，有學者就指出：當全球化力量侵蝕到國家資源與公共權力所涵蓋的範圍時，民主可能被看成是削弱國家能力的制度；相對地，國家能否成功介入跨國經濟體制與全球市場，則被認為比民主化的擴張與深化更重要，甚至覺得民主化的進展會妨礙此一任務的達成，故全球化的結果會降低民主的吸引力。參見 James Cotton, "East Asian Democracy: Progress and Limits," in Larry Diamond, Marc F. Plattner, Yun-han Chu and Hung-mao Tien, eds.,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Regional Challenges* (Baltimore, M. 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12~115. 再者，全球化亦可能因為一國政府無法控制境內事務而破壞民主的運作，亦即假若經濟或其他發展受到外在因素決定，而非由國家領袖所能控制時，直接民選又有何用？參見 Georg Sorenso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Processes and Prospects in a Changing World*. 2nd ed.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8), p. 132.

註⑪ Plattner, *op. cit.*, pp. 58~59.

註⑫ 參見 David Held, *Model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pp. 359~360.

註⑬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pp. 13~30.



即利用「自由之家」的年度統計作為指標，參考 Larry Diamond 的設計，^⑤彙整後製作圖表來說明第三波民主化進展的情況。

表一 選舉的民主國家總數統計分析（一九七四、一九九〇～二〇〇二年）

年 份	民主國家數目	全球國家數目	民主國家占全球國家之百分率	民主國家之年增率
1974	39	142	27.5 %	n/a
1990	76	165	46.1 %	n/a
1991	91	183	49.7 %	19.7 %
1992	99	186	53.2 %	8.1 %
1993	108	190	56.8 %	8.3 %
1994	114	191	59.7 %	5.3 %
1995	117	191	61.3 %	2.6 %
1996	118	191	61.8 %	0.9 %
1997	117	191	61.3 %	-0.9 %
1998	117	191	61.3 %	0.0 %
1999	120	192	62.5 %	2.5 %
2000	120	192	62.5 %	0.0 %
2001	121	192	63.0 %	0.8 %
2002	121	192	63.0 %	0.0 %

資料來源：Raymond D. Gastil, ed., *Freedom in the World: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1988-89* (New York: Freedom House, 1989); 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The Annual Survey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1990-91, 1991-92, 1992-93, 1993-94, 1994-95, 1995-96, 1996-97, 1997-98, 1998-99, 1999-2000, 2000-2001* (New York: Freedom House, 1991~2001); Adrian Karatnycky, "Muslim Countries and the Democracy Gap,"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3, No.1 (January 2002), pp. 99~112; Adrian Karatnycky, "The 30th Anniversary Freedom House Survey: Liberty's Advances in a Troubled World,"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4, No.1 (January 2003), pp. 100~113; Larry Diamond, "The End of the Third Wave and the Start of the Fourth," in Marc F. Plattner and Joao Carlos Espada, eds., *The Democratic Invention*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3~33; 1974年「選舉民主」國家的統計依上述 Larry Diamond 的估計。

註⑤ Diamond, *op. cit.*, pp. 14~18.



表二 獨立國家的自由狀況統計分析（一九七二～二〇〇二年）

年份	自由的（%）	部分自由的（%）	不自由國家（%）	總數合計
1972	42 (29.0 %)	36 (24.8 %)	67 (46.2 %)	145
1980	52 (31.9 %)	52 (31.9 %)	59 (36.2 %)	163
1985	56 (33.5 %)	56 (33.5 %)	55 (32.9 %)	167
1990	65 (39.4 %)	50 (30.3 %)	50 (30.3 %)	165
1991	76 (41.5 %)	65 (35.5 %)	42 (22.9 %)	183
1992	75 (40.3 %)	73 (39.2 %)	38 (20.4 %)	186
1993	72 (37.9 %)	63 (33.2 %)	55 (28.9 %)	190
1994	76 (39.8 %)	61 (31.9 %)	54 (28.3 %)	191
1995	76 (39.8 %)	62 (32.5 %)	53 (27.7 %)	191
1996	79 (41.4 %)	59 (30.9 %)	53 (27.7 %)	191
1997	81 (42.4 %)	57 (29.8 %)	53 (27.7 %)	191
1998	88 (46.1 %)	53 (27.7 %)	50 (26.2 %)	191
1999	85 (44.3 %)	59 (30.7 %)	48 (25.0 %)	192
2000	85 (44.3 %)	60 (31.3 %)	47 (24.4 %)	192
2001	86 (44.7 %)	57 (29.8 %)	49 (25.5 %)	192
2002	89 (46.4 %)	56 (29.2 %)	47 (24.4 %)	192

資料來源：同表一。

一九七四年葡萄牙革命啓動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序幕，當時「選舉的民主」國家總共只有 39 個，佔全球國家總數 142 個中的 27.5 %。但到了一九九〇年，「選舉的民主」國家急遽增加到達 76 個，佔全球 165 個國家中的 46.1 %，民主國家增加的幅度相當快速。自由國家方面，雖然早期統計方式有所不同，但從一九七二年的 42 個（29.0 %）自由國家到一九九〇年 65 個（39.4 %）「自由的民主」國家，亦有顯著成長（見表一、二）。更重要的特色是一九九〇年時，「自由民主」國家佔全體「選舉的民主」國家的比率高達 85.5 %。然而，一九九〇年代的前半段時期有一種矛盾的趨向出現，亦即「選舉的民主」國家持續成長，但「自由的民主」國家卻幾乎停滯增加，造成「自由的民主」國家佔全體「選舉的民主」國家的比率下滑。^⑥不過，一九九六年以後，「自由的民主」國家，佔 117 個「選舉的民主」國家中的 75.2 %。接著

註⑥ *Ibid.*, p. 19.

下來的最近這幾年，「選舉的民主」國家微幅成長，大概維持在 120 至 121 個，而「自由的民主」國家微幅下滑，維持 85 個至 86 個。從二〇〇二年最新的統計看來，雖然「選舉的民主」國家維持不變，「自由的民主」國家略微提升，自由的占選舉的民主國家之百分率較去年上漲 3.4%，但是整體看來第三波民主化的潮流似乎已經接近尾聲（見表三）。現在，大家的目光正集中在眾多的伊斯蘭教阿拉伯國家和廣大的中國大陸是否可能進行第四波的民主化運動，^⑩以及各地區「自由的民主」國家是否會繼續增加擴散的問題。^⑪

表三 選舉的與自由的民主國家統計分析（一九九〇～二〇〇二年）

年 份	選舉的民主國家 (N,%)	自由的民主國家 (N,%)	自由的占選舉的民主國 家之百分率(%)	總數合計
1990	76 (46.1%)	65 (39.4%)	85.5%	165
1991	91 (49.7%)	76 (41.5%)	83.5%	183
1992	99 (53.2%)	75 (40.3%)	75.8%	186
1993	108 (56.8%)	72 (37.9%)	66.7%	190
1994	114 (59.7%)	76 (39.8%)	66.7%	191
1995	117 (61.3%)	76 (39.8%)	65.0%	191
1996	118 (61.8%)	79 (41.4%)	67.0%	191
1997	117 (61.3%)	81 (42.4%)	69.2%	191
1998	117 (61.3%)	88 (46.1%)	75.2%	191
1999	120 (62.5%)	85 (44.3%)	70.8%	192
2000	120 (62.5%)	85 (44.3%)	70.8%	192
2001	121 (63.0%)	86 (44.7%)	71.1%	192
2002	121 (63.0%)	89 (46.4%)	73.6%	192

資料來源：同表一。

此外，下表更進一步顯示，在一九七二和二〇〇二年國家自由程度的比較中，區域和全球「自由的民主」國家百分比消長情形與分析：美洲地區增長 15.7%（一九七

註⑩ 二〇〇一年七月民主期刊 (*Journal of Democracy*) 刊出一篇探討蘇聯一九八九～一九九一年革命的論文指出：人類歷史上有三大革命—美國、法國與蘇聯一九八九～一九九一年革命運動，二十世紀發生了三次世界大戰，即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冷戰。參見 Aleksander Smolar, "History and Memory: The Revolution of 1989~91,"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2, No. 1 (January 2001), p. 5. 而 Huntington 則將人類歷史上的民主化進展劃分成三波。因此，中國是否可能在經濟快速發展以後，在可預見的將來進行所謂第四波的民主化運動，正考驗全體中國人的智慧。參閱李西潭，「第四波民主化的浪潮是否可能在中國發生？」，*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策論壇電子報*，第 25 號（民國 91 年 4 月 19 日），<http://www.socialsciences.nccu.edu.tw/society/composition/020419/main_020419.htm>。

註⑪ 參見 Diamond, *op. cit.* p. 4, 28; Karatnycky, *op. cit.* (2002), pp. 99~112; Karatnycky, *op. cit.* (2003), pp. 100~113.

二年：50.0%，二〇〇二年：65.7%）；西歐地區增長24.0%（一九七二年：72.0%，二〇〇二年：96.0%）；亞太地區增長21.2%（一九七二年：25.0%，二〇〇二年：46.2%）；中東歐和前蘇聯地區大幅增長44.5%（一九七二年：0.0%，二〇〇二年：44.5%）；次撒哈拉沙漠非洲地區增長17.8%（一九七二年：5.1%，二〇〇二年：22.9%）；中東與北非地區降低4.9%（一九七二年：10.5%，二〇〇二年：5.6%）；全世界則總共增加了17.6%（一九七二年：28.7%，二〇〇二年：46.3%）（見表四）。由此看來，誠如 Huntington 在其民主化的比較研究中，透露出民主理念正廣泛蔓延至不同的國家、地域與文化社群；民主政治的散佈幾乎被視為是由某一政治體系擴及至另一政治體系的一種「傳染」。^⑩所以，有關民主化浪潮的現象似乎可以說是全球化趨勢下的重要一環；而全球化進程的影響又似乎和民主化的擴展存有相關性。

表四 國家自由程度類目比較（一九七二年與二〇〇二年）

自由等級	自由		部份自由		不自由	
	1972 年	2002 年	1972 年	2002 年	1972 年	2002 年
地區／年份						
全世界	28.7 %	46.3 %	25.3 %	29.3 %	46.0 %	24.5 %
美洲區	50.0 %	65.7 %	34.6 %	28.6 %	15.4 %	5.7 %
西歐區	72.0 %	96.0 %	16.0 %	4.0 %	12.0 %	0.0 %
亞太區	25.0 %	46.2 %	46.0 %	25.6 %	34.4 %	28.2 %
中東歐和前蘇聯區	0.0 %	44.5 %	0.0 %	33.3 %	100.0 %	22.2 %
次撒哈拉沙漠非洲區	5.1 %	22.9 %	23.1 %	45.8 %	71.8 %	31.3 %
中東與北非區	10.5 %	5.6 %	15.8 %	22.2 %	73.7 %	72.2 %

資料來源：Adrian Karatnycky, "The 30th Anniversary Freedom House Survey: Liberty's Advances in a Troubled World,"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January 2003), p. 104.

叁、民主、民主化、戰爭與和平

當代社會科學最著名的發現之一就是民主國家之間從未發生戰爭。^⑪民主與和平的關係，長期以來一直是關心國際關係的學者所重視的問題，而自從第三波民主化浪

註⑩ 目前既有的文化傳統與資源，是否足以支持國家甚至更廣泛的區域或全球民主深化，仍舊未有定論；即使全球化過程可能使世界趨向統一，但卻不必然產生全球民主管理合法性所仰賴的全球共同意識。因為種種的衝突將導致世界陷入國家、區域、文化和社群的分裂狀態，對於建立全球民主化的可能性造成限制。參見 Held, McGrew, Glodblatt and Perraton, *op. cit.*, p. 451; Landman, *op. cit.*, p. 218.

註⑪ 參見 Edward 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anger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3, No. 1 (Summer 1995), p. 5. 又 John M. Owen 指出，民主國家之間假使有過也很少彼此戰爭的陳述，幾乎已經變成一個人人相信的真理。請參見 John M. Owen, "How Liberalism Produces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2 (Fall 1994), pp. 87~125.

潮席捲全球，使得新興民主國家急遽增加以後，民主化與戰爭、和平的關係正引起廣泛的關注。^①比較政治學者與國際政治學者對於民主化國家與戰爭的關係皆抱持高度的興趣。以下分二部分分析論之。

一、民主與和平

預期民主將帶來和平的理論基礎乃是由德國哲學家 Immanuel Kant 所建立，他在一七九五年〈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論文中指出，國家具有形成自由共和的自然傾向，因為這種統治體系授予政治領導人正當性，並促進人民對國家的支持，使其能面對外國的威脅。一旦建立自由共和的民主國家以後，便會導向和平的關係，因為民主政府受到公民的控制，所以不會加入使公民蒙受流血與戰爭的暴力衝突。^②他所謂民主國家和平聯盟的基礎乃是建立在三個要素上面：第一，民主國家存有和平解決衝突的文化；第二，民主國家間在共同的道德基礎上產生關連性；第三，民主國家的經濟合作邁向互利（見圖一）。^③總而言之，經驗研究發現，雖然民

註① Georg Sorensen 在《民主與民主化》（*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一書短的五章中用一章的篇幅探討〈民主的國際影響：和平與合作？〉引起筆者對於研究這個問題的興趣。而有學者在一九九七年時就撰文指出：過去十年至少有超過一百篇的期刊論文探討民主和平論。分別參考 Sorense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pp. 93~120; W. Thompson and R. Tucker, “A Tale of Two Democratic Peace Critiqu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1, No. 3 (June 1997), pp. 428~451; Michael D. Ward, and Kristian S. Gleditsch, “Democratizing for Pea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1, No. 3 (March 1998), p. 52.

註② Kant 指出：如果需要公民同意以便決定應該宣戰……沒有比他們會非常小心的開始這項不幸遊戲、宣布他們自己處於戰禍之中更自然的了。一旦宣戰便須戰鬥，需掏出自己的資源做為戰爭的代價，需修復戰爭所留下來的荒廢狀態，還有，須補救各種弊害，使自己負擔沈重的國債，而傷害和平本身，甚至可能因為未來不斷的戰爭而永遠清償不了。參考 Sorense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pp. 93~94; Hans Reiss, ed., *Kant's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00.

註③ 然而，Kant 對民主和平世界的觀點，屬於理想主義的思想學派。理想主義的基本觀點，是認為假如世界根據某些原則而組織起來時，便可克服衝突與暴力。假如人類對於「正確」理念賦予最優先權，和諧便是可能的；在 Kant 方面，正確理念便是民主。這樣的觀點受到現實主義思想的駁斥，他們宣稱應以實然而非應然面來分析世界。在現實世界中，衝突之來臨是由於人類天性固有力量的，還有世界上的人選擇獨立的主權國家形式。主權國家不會尊重比它們更高的權威，因此沒有世界政府的存在。而在該意義下，無政府狀態乃國家體系的基本特徵，衝突因此來臨。國家無法真正信任另一國，一個國家利用提升軍備來增加安全，無可避免地會威脅到其他國家的安全。簡言之，只要有主權國家，便會有以無政府狀態為特徵的國家體系存在。只要有無政府狀態，便會有暴力衝突的威脅。在此體系下，Kant 所設想的永久和平實屬天方夜譚。參考 Sorense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pp. 95~96, 114~115 因此，Melvin Small 與 J. David Singer 分析一八一六至一九六五年之間的戰爭，發現從涉入戰爭的頻率來看，民主和其他體制之間並無顯著差異性。Steven Chan 研究一八一六到一九八〇年間的戰爭亦獲得同樣的結論。然而，爭議並未完全停止，例如：Nils P. Gleditsch 與 Havard Herge 檢視從一八一六至一九九四年這段期間中民主國家的比例與戰爭爆發的次數，發現從一八一六至一九一五年這一百年中，兩者皆呈現上升趨勢，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到一九九四年這個時期，民主國家比例上升，戰爭次數卻一直減少。分別參見 Melvin Small, and J. David Singer, “The War-Proneness of Democratic Regimes,” *The Jerusale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 No. 4 (Summer 1976), pp. 50~69; Steve Chan,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Are the Freer Countries More Pacific?”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28, No. 4 (December 1984), pp. 617~648; Nils P. Gleditsch and Havard Herge, “Peace and Democrac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1, No. 2 (April 1997), p. 305.

主國家和其他體制都有戰爭傾向，但民主國家之間不會互相作戰。^②至於民主國家之間從未發生戰爭，尚牽涉如何界定民主的問題。自由民主國家的自由主義思想觀念使其遠離彼此戰爭的禍害，但也是同樣的自由主義思想原因使其傾向於與非自由主義的國家發生戰爭。自由主義對於個人自由承諾所產生的外交政策意識型態，再與政府制度運作在一起就導致民主的和平。在意識型態上，自由主義國家彼此相互信任就認為沒有理由互相開啓戰事，但有時則會以戰爭來對抗非自由主義的國家。^③由此觀之，通常民主國家間不易發動侵略戰爭，大多數民主國家都會關心自身的利益和尊重他國間取得一貫性的平衡；儘管民主政府並不保證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之間紛爭的捍衛者自居，但是世界各國愈是民主自由，相信世界就愈可能和平與安定。

圖一 Kant 的民主國家間和平聯盟的要素

第一要素 和平解決衝突的民主規範
第二要素 民主國家之間基於共同道德基礎的和平關係
第三要素 民主國家間的經濟合作：互賴的聯結

資料來源：Georg Sorense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Processes and Prospects in a Changing World*, 2nd ed.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8), pp. 95~96.

二、民主化與戰爭

民主與和平的關係已如上述，然而隨著「第三波」新興民主國家急遽、快速地增加，晚近（一九九五年以後）有些學者開始將研究的焦點轉向民主化與戰爭、和平的關係。且他們大都採用統計的方式列表來處理，得到一些頗值得參考的結論。茲簡要列舉如下：

註^② 參考 Zeev Maoz and Bruce Russett, "Normative and Structural Causes of Democratic Peace, 1946-198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7, No. 3 (September 1993), p. 624; Arvid Raknerud and Havard Herge, "The Hazard of War: Reassessing the Evidence for the Democratic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4, No. 4 (November 1997), p. 385; Ward and Gleditsch, *op. cit.*, p. 51; Sorense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p. 95.

註^③ Owen, *op. cit.*, pp. 87~93, 124. 此外，Michael W. Doyle 亦指出：因為非自由的政府處於侵犯自己人民的狀態，他們的外交關係因此被自由主義政府所深深懷疑。簡言之，同是自由國家，彼此在友好關係的推定下獲得好處，非自由國家則在敵意的推定下受害。參見 Michael W.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 No. 4 (December 1986), p. 1161.

(一) Edward D. Mansfield 與 Jack Snyder 於一九九五年合撰一篇〈民主化與戰爭的危機〉(“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anger of War”)的論文，他們首先指出：一個國家不會一夕之間成為成熟的民主，在民主轉型階段，國家會變得更具攻擊性，更好戰，也會與其他民主國家戰爭。換言之，正在民主化的國家比成熟的民主國家或穩定的專制政體更可能發生戰爭。民主逆轉的國家比尚未轉變的體制更可能發生戰爭。²⁶因此，他們在列表統計分析一八一—~一九八〇年間戰爭的可能性以後發現，很難透過推動民主化來拓展和平，國際社會不應一味地推動民主化而應該更致力於幫助他國順利的民主轉型。民主化和戰爭間的關連是存在的，民主化可能導致戰爭也可能帶來和平。依據拉丁美洲的例子，最平順的民主轉型是給予舊菁英降落傘，保障他們的未來安全，但也保證他們的弱化。此外，對一個民主化中的國家，首先最必須做的是創造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並且多元主義可以提供團體的發聲管道。同時國際環境也是重要的因素，環境的自由氛圍比較能夠幫助民主化中的國家順利轉型。²⁷

(二) Nils Peter Gleditsch 與 Harvard Herge 在以三個層次(兩國之間、多國之間與國際體系)統計分析一八一六~一九九四年之間和平與民主的關係以後指出：進一步民主化將減少戰爭的可能性。短期而言，參與戰爭可能削弱民主的基礎，但長期來說，戰爭似乎可促進更多民主國家，且更多民主國家會導致減少戰爭。因此，民主和平的樂觀前景長期而言似乎可獲得確保。當然，若以戰爭作為民主化的策略，這個世界將可能有短暫的不和平時期。²⁸

(三) Micheal D. Ward 與 Kristian S. Gleditsch 於一九九八年比較全球性的國家樣本，並對民主化與國際戰爭進行測量。他們發現崎嶇而不穩定的民主轉型會使國際戰爭發生的機率增加，但民主化過程本身並不會導致戰爭。²⁹換言之，穩定且鞏固的民主國家之間可能不會互相戰爭，但民主化過程中若遭遇挫敗而發生民主倒退的現象，則會增加戰爭的可能性。³⁰

(四) Mark J. C. Crescenzi 與 Andrew J. Enterline 用文獻評論方式檢視一些研究

註²⁶ Mansfield 與 Snyder 就特別指出，部分選舉的民主國家，就像俄羅斯入侵車臣一樣，粗魯的使用軍事武力。至於為何民主化過程中的國家如此好戰？可能的原因包括有：(一) 威權政體瓦解後，國內政治競爭的本質，使得舊政體遺留下來的菁英和新的政治菁英在利益和權力的競爭過程中，以戰爭作為手段之一；(二) 菁英透過民族主義意識型態的動員，企圖在戰爭中獲得利益；(三) 民主化過程缺乏有力的政黨、健全的媒體等機制，使得政治運作難以在外交議題上發揮如成熟民主國般的效果；(四) 民主化的過程容易威脅到軍隊的利益，而導致戰爭。參見 Mansfield and Snyder, *op. cit.*, pp. 5~25.

註²⁷ *Ibid.*, pp. 36~38。

註²⁸ Gleditsch and Herge, *op. cit.*, p. 308.

註²⁹ Ward and Gleditsch, *op. cit.*, p. 53; cf. Landman, *op. cit.*, p. 218.

註³⁰ *Ibid.*, p. 53, p. 60.



民主化與戰爭的研究以後，以民主國家比例、民主化與戰爭三者關係做量化研究以後指出：與全球相較，當某個區域民主國家數目偏低時，民主化與戰爭即存在正向關係。換言之，民主、民主化與戰爭雖具有相互關連性，但也隱含區域的獨特性。三者間並非各自獨立的現象，更精確的動態關係尚需進一步研究。^①

(五) Edward D. Mansfield 與 Jack Snyder 於二〇〇二年進一步撰寫一篇有關民主轉型與戰爭的論文，他們首先指出：二十世紀九〇年代是民主化與民族主義相互對抗的時期，不管是在民主轉型國家內部或是轉型國家之間，都可以見到這種對抗情勢。他列舉了新興民主國家通常既不自由也不和平，例如南斯拉夫、高加索、印尼由之前獨裁政體轉型為多元政體時並不平靜，境內的民族獨立運動高漲，最後往往演變成國際事件；另外轉型政體彼此之間也會發生戰爭，例如衣索比亞和厄立特里亞（Eritrea）在一九九八年至二〇〇〇年的邊界戰爭。即便是民選政體的印度與巴基斯坦在一九九九年也為喀什米亞爭議大打出手，而分別在八〇及九〇年代開始民主轉型的秘魯與厄瓜多也為了領土而開戰。因而得到一個結論：「民主轉型國家實質上比那些未進行轉型或仍維持獨裁的國家更容易與鄰國發生戰爭」，這是因為轉型國家的菁英份子常常訴諸於民族主義大蠱，取得大眾的支持以迴避政治責任。^②故作者提出建議：進行民主轉型的同時應該還要強化中央政府的權力，如此方能承受國家及民粹政客的壓力。在要求民主轉型國家進行全國性的競爭大選之前，國際社會應該鼓吹及協助該國建立依法而治、公平的司法體系、選舉委員會、專業且獨立的新聞媒體及有能力和訓練有素的文官組織。^③

綜上所述，民主轉型國家實際上比那些未進行轉型或仍維持獨裁的國家更容易與鄰國發生戰爭。民主和平論必須要在民主轉型國家已經進入民主鞏固時期才會成立。因此，民主轉型可能增加戰爭的危險，假若民主鞏固一旦確立，戰爭的危險應會急速降低。民主化過程不必然會導致戰爭，但崎嶇而不穩定的民主轉型會使國際戰爭發生的機率增加；已經鞏固的民主國家之間可能不會互相戰爭，但民主化過程中若遭遇挫敗而發生民主倒退的現象，則會增加戰爭的可能性。總之，穩定且自由的民主政體之優點相當顯而易見，故國際社會成員有義務提供協助與資源給民主轉型國家以防止他們走向敵對行爲。

註① Mark J. C. Crescenzi and Andrew J. Enterline, "Ripples from the Waves? A Systemic, Time-Series Analysis of Democracy, Democratization, and Interstate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6, No. 1 (January 1999), pp. 92~93.

註② Edward 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Democratic Transitions, Institutional Strength an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2 (Spring 2002), pp. 297~298.

註③ *Ibid.*, p. 334.

肆、台灣民主化的過程與經驗

依據前述美國「自由之家」的指標調查，^④從一九七二年開始評比，三十年來，台灣的自由程度經歷以下幾個重要階段：一九七二年，台灣兩項分別為第六等、第五等，列為不自由國家。一九七六年，「政治權利」升為五，「公民自由」不變，首度列名「部份自由國家」。爾後由於解除黨禁及報禁、開放赴大陸探親等，自由度逐漸上升。一九九〇年的兩項評比都晉升為三，仍屬「部份自由國家」。台灣自從一九九六年三月總統大選後，即被列入既是「選舉的民主」國家，也是「自由的民主」國家之行列；民主政治的精髓在於人民有權利，透過定期、公開、公平與自由的全國性大選，選擇統治者。所以，此次台灣所完成的總統直選，不但是民主化的關鍵，也是民

註④ 「自由之家」所採用的指標，乃是擴張 Robert Dahl 的觀點，但基本方法並未改變。可參見 Paul Barry Clarke and Joe Foweraker, eds., *Encyclopedia of Democratic Though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 351. 他們所採用的指標值得列舉如下，以資參考。(一) 政治權利指標：1、政治領袖是否透過公平與自由的選舉產生？2、立法代表是否透過公平與自由的選舉產生？3、是否具備公平的選舉法規、平等的競選機會、公平的投票過程以及誠實的表列選票數目？4、由選民經公平過程選出的代表是否具備實質的權力？5、人民是否有權依其意願去組織不同型態的政黨或其他競爭性政治團體，且此系統是否允許這些競爭性政黨或團體的更迭？6、一項選舉中是否存在明顯的反對派，有無實質的反對力量，同時反對派有無實質可能經由選舉而獲得權力或增加支持度？7、人民是否免於軍隊、外國勢力、極權性政黨、層級性宗教機構、壟斷性經濟組織或其他權力團體的支配？8、文化、種族、宗教及其他少數團體是否能經由政策決定過程中所獲得的非正式化共識而擁有合理的自決、自治、自主及參與權利？(二) 公民自由指標：A、表意與信仰自由—1、是否存在自由且獨立的傳播媒體、印刷媒介或文化傳播管道？2、是否擁有自由的宗教機構、私密或公開的宗教表達是否不受限制？B、結社與組織的權利—1、是否有集會及遊行的自由？2、是否擁有組織政治性或準政治性的團體之自由？3、是否擁有自由的貿易聯盟及農業組織，且其間能否進行有效的集體協商？專業人員及其他私有組織是否擁有自由？C、法治與人權—1、是否擁有獨立的司法制度？2、法律是否平等地對待公民、司法機關是否獨立超然、情治機關是否尊重公民自由？3、任何團體無論對政治體系之立場係為支持或反對，其是否皆能免於政治恐嚇或非法拘禁、放逐、刑訊的威脅？以及人民有無免於戰亂的自由？4、是否擁有免於政府的冷漠或貪腐之自由？D、個人自治權與經濟權利—1、是否有公開或私密的討論自由？2、是否有個人自治權？國家是否控制人民遷徙、居住或職業的選擇？以及是否有積極信賴出於政府教化的自由？3、商業交易或合作是否自由？財產權是否安全無虞？公民是否擁有建立私人企業的權利？私營企業活動是否過度受官方宰制、軍警保護或系統犯罪所影響？4、是否擁有個人性的社會自由，諸如性別平等、私有財產權、遷徙的自由、居住的自由、婚姻選擇的自由、家庭規模自主的自由？5、機會平等是否存在，諸如免於剝削的自由，或在正當經濟賺取之過程中免於因對地主、雇主、聯盟領袖、官僚體制或其他種類的組織之過度依賴而遭貶抑壓榨？其它詳細內容，見下列兩網址：<<http://www.freedomhouse.org/research/freeworld/2002/methodology2.htm>>及<<http://www.freedomhouse.org/research/freeworld/2002/methodology3.htm>>。

主政治最重要的里程碑。^⑤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完成了第一次政權的和平移轉後，人民所享有的政治權利更進一步提升，被評定與日本列為亞洲地區最自由的國家（平均指數為 1.5）。^⑥台灣民主化的進展此時不僅能超越俄羅斯、巴西等只是被列為「選舉的民主」國家之水準，且自由等級的排名列在南韓、菲律賓等亞洲更早民主化國家的前面。根據二〇〇二年的評比，在亞太地區 18 個自由的民主國家中，台灣與南韓、泰國被列為過去十年除了經濟發展令人印象深刻，且伴隨著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的擴張，因而挑戰了所謂「亞洲價值」中威權政體與經濟發展必然相結合的論調。^⑦

一、台灣民主轉型的階段

有關民主轉型的階段歷程，早在一九七〇年 Dankwart A. Rustow 就提出一個模型，後來學者 Georg Sorensen 據此稍加修改，用來描述轉型過程中的主要因素，試圖使研究者能夠獲得更具體的幫助（見圖二）。^⑧該模型從國家統一的背景條件開始，隨著時間的推移，由非民主統治轉型到民主階段的過程，但在實際世界中各階段經常重疊。民主轉型的第一階段為準備階段：是以政治鬥爭導致非民主政權瓦解為特徵；第二個階段是決定階段：民主秩序的明確要素已經建立；最後一個階段為鞏固階段：新的民主進一步發展，民主習慣已確立為政治文化的一部份。^⑨

註⑤ Adrian Karatnycky, "Freedom on the March," *Freedom Review*, Vol. 28, No. 1 (January/February 1997), pp. 6~8; Adrian Karatnycky, *Freedom in the World: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New York: Freedom House, 1997), pp. 3~8, 475~477, p. 584; Adrian Karatnycky, *Freedom in the World: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New York: Freedom House, 1998), pp. 487~489; Adrian Karatnycky, *Freedom in the World: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New York: Freedom House, 1999), pp. 112~116; Adrian Karatnycky, *Freedom in the World: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New York: Freedom House, 2000), pp. 468~470; Adrian Karatnycky, *Freedom in the World: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New York: Freedom House, 2001), pp. 5~15, 521~524. 以及參考李酉潭，「邁向鞏固的民主：台灣案例」，*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 5 卷第 2 期（民國 86 年 6 月），頁 171；李酉潭，「從民主化相關概念探討台灣民主轉型的歷程—兼論孫中山建國三程序的意義與作用」，*政治學報*，第 29 期（民國 86 年 12 月），頁 160~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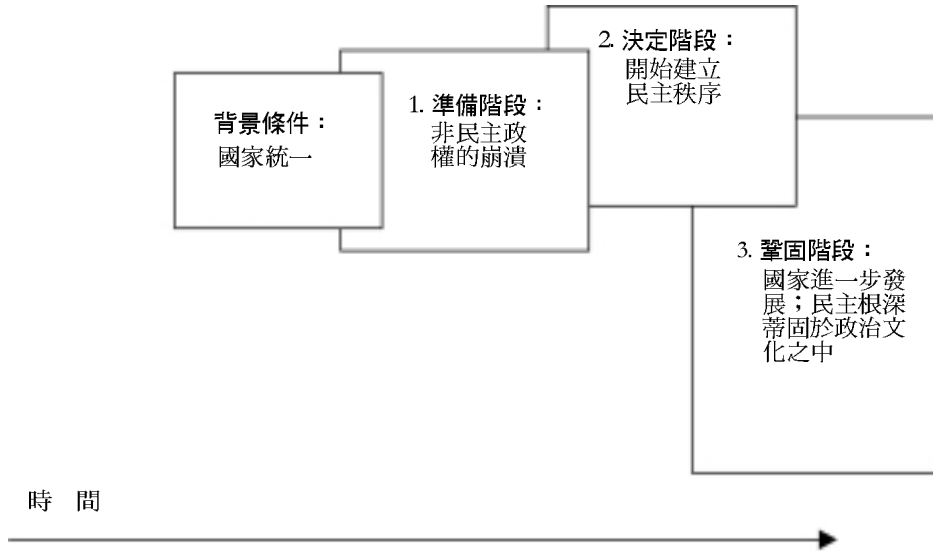
註⑥ 台灣自由程度在政治權利方面的等級是“1”（因為自由、公正的總統選舉和有秩序的政權移轉，使台灣評等首次提昇至第一級）；公民自由方面的等級是“2”（雖然沒有異動，但陳定南的掃黑行動也使台灣被推舉為全世界五大自由進展國家之列），自由等級首次超越南韓（2.0）。參見 Karatnycky, *op. cit.*, (2002), pp. 108~109.

註⑦ Karatnycky, *op. cit.*, (2003), pp. 103. 剛出爐最新二〇〇三年的調查報告指出：台灣已經順利完成政治上的進展，並有令人欽佩的經濟成長率，且又是亞洲地區十七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之一。參見 Adrian Karatnycky, "The 2003 Freedom House Survey: National Income and Libert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1 (January 2004), p. 85.

註⑧ Dankwart A.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 No. 3 (April 1970), pp. 350~361; Sorense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p. 40.

註⑨ *Ibid.*, pp. 40, 45. 另外，有學者將台灣民主歷史的進程分為三波：（一）民主起步階段；（二）民主轉型階段；（三）民主鞏固階段。參見阮銘，*民主台灣 vs. 共產中國*（台北：玉山，民國 90 年），頁 261。

圖二 民主轉型的一個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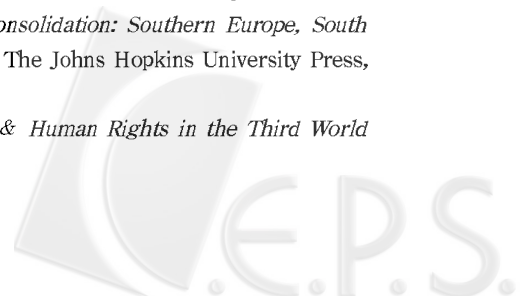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Sorense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p. 40.

就台灣政治發展過程而言，自由化和民主化是二個不同但卻緊密相連的階段。^④漸進的經濟與政治自由化導致增進民主化，這種自由化的成長，進而要求進一步的民主化，反而有助於民主政治的穩定建立。^⑤因此，參考上述 Rustow 民主轉型的模型來

註④ Guillermo O'Donnell 與 Philippe C. Schmitter 早在一九八六年就已經正確地堅持區別自由化與民主化。政治自由化指涉的是在威權政體內壓制的舒緩與公民自由的擴張，而民主化指涉的是轉向民主政治的運動，亦即轉向不同的政治體制。自由化並不總是導引至民主的轉型。參考 O'Donnell, Guillermo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M. 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78; Mainwaring, Scott,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issues," in Scott Mainwaring, Guillermo O'Donnell and J. Samuel Valenzuela, eds., *Issues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2), p. 298. Juan J. Linz 與 Alfred Stepan 亦強調應該清楚區別自由化與民主化。自由化是指在非民主政體的機制之下可能伴隨一些政策與社會變遷，例如比較少的媒體檢查，有時候給予自主性勞工運動較大的空間，引介一些諸如人身保護令 (habeas corpus) 的個人防衛，釋放大多數的政治犯，讓被放逐者回來，更重要的是容忍反對人士。民主化需要自由化，但更廣泛也更具有特別地政治概念。民主化需要自由競爭的選舉以決定誰統治。使用這樣的定義，很明顯地有可能自由化，但沒有民主化。參見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M. 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

註⑤ Monshipouri, Mahmood, *Democratization Liberalization & Human Rights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5), p. 16.



加以運用，似乎可以得知：台灣從一九八六年民進黨成立或一九八七年蔣經國總統宣佈戒嚴令解除才開始啟動自由化；繼而經過一九九一、一九九二年國會全面改選的民主化接續，和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的民主化實踐，成功進行了民主轉型，且於二〇〇〇年接受民主鞏固政黨輪替的嚴峻試煉；由民主起步的準備階段，歷經民主轉型的決定階段，進而到達民主鞏固的初期階段，但是尚未達到完全的鞏固，因為民主的規範尚未在台灣各個層面普遍習慣與適應，唯有民主深植於人心並由衷地信服民主制度，民主政體才能說是完全穩固。^④

二、台灣民主化的成就

台灣民主的轉型恰巧與全球性獨裁集權主義危機和民主化浪潮興起的時間相呼應；台灣民主轉型的進展並未造成原來威權體制的遽然崩潰，其快速的民主發展亦未導致大幅度的經濟成長衰退、社會的動亂和嚴重的政治傾軋。亦即台灣政權內部發生了一場由威權體制走向自由民主國家轉型的「寧靜革命」。^⑤然而，究竟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具有何種特質？相較於其他同樣處於民主轉型新興民主國家，具有下列非常獨特的特色：(一) 台灣民主轉型的過程，並非再一次的民主化蛻變；(二) 台灣民主轉型始於一黨專制，並非由軍事政權過渡到民主體制；(三) 台灣民主轉型沒有遭到重大政經危機衝擊，並未伴隨社經改革的要求；(四) 台灣民主轉型乃潛在族群分裂與衝突，並促使台灣政治本土化；(五) 台灣民主轉型不僅對合法性提出異議，並對國家正當性有所質疑。^⑥另外，由執政黨改革派帶頭與反對黨溫和派進行協調磋商，並引領國家邁向民主化的變革模式；^⑦政府與反對派皆展現成熟的民主表徵，致使社會並未發生

註② 參考李西潭、張孝評，「台灣民主化分析 — Rustow 與 Huntington 模式的檢驗」，*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 10 卷第 2 期（民國 91 年 12 月），頁 68。在「2001 年選舉與民主化研究」學術研討會中，有學者研究指出：檢視台灣過去十年來，民衆對於政治人物的信任、對自我政治功效意識的提昇、以及對民主基本原則的尊重，是促進政黨競爭、政權和平轉移、以及社會安定的重要心理基礎；開放且自由競爭的選舉，對於民衆的政治功效意識的確有正面的影響；所以，一個健全的民主國家，需要建立在民衆具有較佳的民主素養上。參見陳義彥、陳陸輝，「政治功效意識、政治信任感以及台灣選民的民主價值」，2001 年選舉與民主調查研究研討會（台北：「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規劃與推動委員會，民國 90 年 10 月 19~20 日），頁 23。

註③ 所謂「寧靜革命」具有雙重含義：（一）台灣的民主進程沒有暴力和流血，是百分之百的和平演變；（二）完全符合「寧靜」的詞義，幾乎無聲無息、沒有被外界注意就實現了民主轉型。參見阮銘，*民主在台灣*（台北：源流，民國 89 年），頁 30~33。

註④ 有關特色的說明與介紹，請參考 Yun-han Chu, "Taiwan's Unique Challenge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3 (July 1996), pp. 69~71.

註⑤ Huntington 分析民主化過程的三種類型：首先，當執政的菁英帶頭實現民主時就出現變革（transformation）。另外，第二種是替換（replacement），當反對派團體帶頭實現民主，而且威權政體垮台或被推翻時，便出現替換，例如葡萄牙、菲律賓。第三種進程則是移轉（transplacement），當民主化主要是因為政府和反對派團體採取聯合行動而實現時，便出現所謂的「移轉」，例如韓國、南非。參見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pp. 114~163. 需要進一步的說明乃是：本文依據 Huntington 對於民主化過程類型將台灣歸類為威權政權一黨制在經濟發展成功後，掌權者扮演決定性角色並發揮帶頭作用的變革模式；但是並未因此否定民主化原因中的各種可能因素，包括：反對勢力的爭取、公民社會興起與壓力、甚至外在國際環境的影響、或是所謂示範效應或滾雪球等。參考李西潭，「從民主化相關概念探討台灣民主轉型的歷程—兼論孫中山建國三程序的意義與作用」，頁 175。

重大的暴力，這般的理性妥協、低度暴力亦是台灣民主轉型的卓越表徵。^④

二十世紀末是台灣蛻變成長的時代，從國會全面改選到總統直接民選，^⑤「台灣第一波民主」可謂成績斐然，不但奠定民主政治的形式，更發動民主轉型肇始的列車。因為如果用普選的方式選出最高決策者是民主政治的精髓，那麼民主化過程的關鍵就是用自由、公開、和公平的選舉中產生的政府，取代那些不是以這種方法產生的政府。^⑥二十一世紀來臨前夕，台灣首次完成政黨輪替的政權和平移轉，「台灣第二波民主」可謂正式開啓，不但樹立民主轉型的典範，更締造了民主政權變遷的新頁。台灣人民用手中的民主的選票完成歷史性的政黨輪替，這不僅是中華民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更是全球華人政治社會劃時代的里程碑；不只為亞洲民主經驗豎立典範，也為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增添新的例證。^⑦有學者表示，在近幾年差不多一百個被認為正在政權轉型的國家中，僅有少數比例且不超過二十個國家能夠清楚明白地走向成功

註④ 在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中，執政的國民黨改革派扮演重要且決定性的角色，其逐步由一威權而排他性的政黨，朝向民主、競爭的政黨體系邁進，同時亦由外造政黨轉變為內造政黨；參見江炳倫、吳文程，「國民黨政治角色的轉變」，*中華民國民主化一過程、制度與影響*（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81年），頁121。爾後藉由黨內初選制度與菁英的分化，使得黨國體制發生內在的轉化——從「民主集中制」到「黨內民主」。參見倪炎元，*東亞威權政權之轉型：比較台灣與南韓的民主化歷程*（台北：月旦，民國84年），頁165~166。為了達到政治改革的目標，國民黨常和民進黨領袖進行協商與合作，並逐漸減低國民黨內保守派的政治勢力，以利民主化的進行。再者，台灣雖在民主化過程初期，曾出現低度暴力事件，但並未發生嚴重的流血或傷亡。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的高雄美麗島事件，遊行過程中雖出現暴力，但是僅一百八十三名警察受傷；參見蔡玲、馬若孟著，羅珞珈譯，*中國第一個民主體系*（台北：三民，民國87年），頁68~70；阮銘，*民主台灣 vs. 共產中國*，頁208。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台灣反對派主要領袖譴責群眾在機場用石塊攻擊警車，並宣佈「安全第一、自由第二」。參見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p. 195。二〇〇〇年三月總統大選後，發生群眾包圍國民黨黨部的暴力事件，民進黨主席林義雄呼籲黨員用充盈的瞭解與愛心來看待抗議民眾，不可有任何對立的行動，建立了政黨輪替的風度與模範。參閱*中國時報*，民國89年3月22日，版5。

註⑤ 台灣民主化的指標乃視「國會全面改選」與「總統直接民選」而定。一九九一年五月正式結束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以後，才有一九九一年第二屆國大代表的全面選舉。此具有二項重要意義：（一）朝向民主化過程中的一個大步驟；（二）國民大會具有修憲權，包括決定如何選舉總統、副總統，以及決定台灣到底是總統制或內閣制。至於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立法委員全面改選的重要意義，乃是國民黨第一次允許政權公開的民主競爭，亦即反對黨第一次有機會變成執政黨。因此，大多數觀察家視此次選舉為進一步民主化的最大貢獻。見 John F. Copper, *Taiwan's 1991 and 1992 Non-Supplemental Elections: Reaching a Higher State of Democracy* (Lanham, M. 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4), p. 23, p. 45.

註⑥ 當代研究民主政治與民主化的學者幾乎都會提到 Joseph A. Schumpeter 所提出的民主程序性定義：「民主的方法乃是達成政治決定的制度安排，在此種安排下某些人相互競爭人民的選票以獲得決策的權力。」見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76), p. 269。又 Huntington 視選舉競爭乃民主政治的本質，因而其認為判別民主的標準是：最有力量的集體決策者是否經由公平、公正和定期的選舉產生，在這種選舉中候選人可以自由地爭奪選票，而且基本上所有的成年人都具有投票權。請參見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pp. 5~13.

註⑦ 參閱陳水扁總統就職演說講稿：「台灣站起來：迎接向上提升的新時代」，民國89年5月20日，刊載於未來中國論壇網，〈http://www.future-china.org/spc_l_rpt/vote2000/2000b52001.htm〉。

的民主道路：擁有完善的民主運作程序，或者至少具備某些民主制度的開展，而且充滿信心地享有民主化的動能。^④其中最值得注目且唯一的東亞國家就是台灣；相較於菲律賓與南韓的民主進度，似乎向前推移了一大步。雖然這些國家政權過渡移轉的處境並不是堅如磐石，但卻能因經過足夠時間的歷練成長，散發出意義非凡的民主曙光，進而成爲民主轉型的典範。^⑤然而，爲了保證台灣民主化成果能夠順利地運作生存，尚須徹底通過「兩次輪替測試」（two-turnover test）的試鍊並使民主根深蒂固於政治文化中；^⑥另一方面在自由程度曾被評比爲與英、法、日、德、義等先進民主國家並列的同時，如何深化民主，以期待開創出更高品質與內涵的「台灣第三波民主」，乃是台灣邁向先進民主國家必須面對的挑戰。^⑦

註④ Larry Diamond, "Is The Third Wave Over?"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3 (July 1996), pp. 20~37.

註⑤ Thomas Carother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3, No. 1 (January 2002), p. 9.

註⑥ Huntington 則在第三波一書中提出一個衡量鞏固程度的標準，那就是「兩次輪替測試」。運用這種測驗，如果在轉型期的初次選舉中掌權的政黨或團體，在此後的選舉中失利，並把權力移交給選戰中的獲勝者；然後，如果這些獲勝者又和平地把權力移交給次一屆選舉中的獲勝者，那麼，這樣的民主政權就可被認爲是已經鞏固。因爲透過選舉選擇統治者是民主政治的精髓，唯有統治者願意依據選舉的結果而放棄權力，民主才是貨真價實的。參見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pp. 266~267. 此外，前述Rustow提出的民主化模式中，早就將民主鞏固階段界定爲：民主根深蒂固於政治文化之中。而Sorensen更進一步指出：鞏固不是純粹的政治過程，而是也需要社會與經濟的變遷，且鞏固的最後階段乃是民主的制度與實際變成政治文化根深蒂固的過程。參見Sorense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p. 46. 故這種廣義的民主鞏固概念提供了一種更爲豐富，可以區分鞏固內容細節差異的觀察角度，並且提供了欲克服狹義概念侷限性的學者一個研究的起始點。也就是這種民主的多面向觀察提供了狹義概念所無法達到的成果。畢竟Huntington提出「兩次輪替測試」來作爲檢驗民主是否鞏固的標準雖然明確清晰，但難免流於狹隘與形式化；唯有民主根深蒂固於台灣的政治文化之中，民主鞏固才真正實質完成。若依「兩次輪替測試」定義，那麼台灣短期內似乎就可以完成民主鞏固。但若依廣義的民主鞏固定義，顯然台灣可能還需要數十年的時間，因爲「西方先進國家75%到92%支持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形式，民主鞏固的門檻至少也要有70%的支持；但台灣人民支持民主的水平仍然偏低，在一九九八年時只有54%而已。」參考Yun-han Chu, Larry Diamond, Doh C. Shin, "Halting Progress in Korea and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2, No. 1 (January 2001), pp. 124~125; 李酉潭，「民主鞏固概念的爭議」，台灣政治學會2002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政治學會，民國91年12月14~15日），頁20~21。

註⑦ 參考李酉潭，「邁向先進的民主：二十一世紀台灣民主化的展望」，「跨世紀的政治願景」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東海大學，民國88年），頁43~65。Andreas Schedler 所謂的民主深化乃是指：民主政治的品質如何從「選舉的民主」與「自由的民主」提升到「先進的民主」之水準。Andreas Schedler, "What i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9, No. 2 (April 1998), pp. 91~107. 另參見註④的說明。

伍、中國進行民主化的可能性

在描述民主的全球性擴散時，如何解釋民主化出現的可能性？民主的建立與維繫，是否具有特定客觀的先決條件？^④就經歷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而言，當初「無法擺脫威權主義宿命」的若干國家，為何最終遭受民主轉型的洗禮？^⑤Huntington認為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增加的民主國家數量，乃是世界歷史上一項空前的紀錄。^⑥他的全球性民主化比較分析，乃是試圖說明國家在此一期間邁向民主化的原因與過程；其研究中所提及的若干引發民主化原因與要素，對於我們瞭解中國未來實行民主化可能性的問題上，或許能夠找到一些軌跡和答案。

一、民主化波浪的探因

首先，關於民主化發生的肇因，Huntington從理論與經驗的多樣性，來研究分析促進一九七四年之後民主化浪潮現象的五項主要因素，這些解釋包括：(一) 合法化危機—先前的威權政權的合法性危機逐漸浮現；(二) 大幅度的經濟發展—經濟在一九六〇年代出現高度的經濟成長率；(三) 宗教或文化變遷—西方天主教會的活動與信條產生變動，以及東方儒家社會的傳統規範；(四) 外來勢力的影響—外在重要政治行為者的政策發生改變；(五) 「滾雪球」或「示範效應」—因為具有典範意義且已經民主化的國家，可以被當作民主政治仿效的對象；或者是一個國家成功地實現民主化，將會擴展並鼓勵其他國家的民主化。他視合法性危機為一個「令政治分析者避之唯恐不及的含糊概念；但它對於理解威權政權在二十世紀末所面臨的問題是絕對必要的」。^⑦他承認經濟發展與民主間並無必然關係，然卻又有意無意暗示兩者具有正向關聯性；經濟發展為民主奠定基礎，無論在經濟快速成長或經濟衰退時期出現的政治危機，都會削弱威權主義政權。他宣稱一九九〇年時全球將近 75 % 的第三波國家為天主教國家，因為天主教會從上而下對威權政權施加壓力，並啟動民主轉型的進程。他指出任何主要的文化，甚至包括儒家思想都有一些與民主相容的成分，儒家民主也許是一種

註④ T. L. Karl, "Dilemmas of 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3, No. 1 (October 1990), pp. 2~3.

註⑤ D. Levine, "Paradigm Lost: Dependency to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Vol. 40, No. 3 (April 1988), p. 377; A.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Cambridge, 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

註⑥ 同註④, p. 26.

註⑦ *Ibid.*, pp. 45~46。關於民主化發生的原因，Huntington又從理論的多樣性和經驗的不同中得出以下命題：(一) 沒有單一的因素足以解釋在所有國家，或是在一個國家的民主發展；(二) 沒有一個單一的原因對所有國家的民主發展是不可或缺的；(三) 每一個國家的民主化都是各種原因配合的結果；(四) 這些造成民主化的原因組合，因國家的情況不同而異；(五) 通常導致一波民主化諸多原因的組合，不同於導致其他各波民主化原因的組合；(六) 導致民主化浪潮中最初政權的諸多原因組合，可能不同於導致在這一波中後來政權變化的原因。參見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p. 38.

矛盾的說辭，但儒家社會的民主則未必如此。他建議歐洲共同體的建立、前美國總統卡特與雷根時期的政策，以及前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採取的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改革，雖然有助於促進民主化的發生，但仍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去評估其對任一國家所產生的影響。他強調示範效應拜全球傳播之賜而無遠弗屆，並在地理上相近或文化上相類似的國家中益加強烈，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在相對重要性上發生變化。^⑤由上述 Huntington 的看法可知，民主化並非由單一因素所促成，全球性質化研究在分析上也可能受到侷限，但至少開闢出若干可依循的研究方向。^⑥

其次，檢視未來中國是否可能進行民主化，參考 Huntington 假設第三波民主化出現的幾項論述，我們應該可以大致地歸納出下列幾項看法：

(一) 就經濟發展、天主教會與儒家思想影響方面

快速的經濟成長不可避免地會對中國的威權政體加以挑戰，但未必會保證民主體制的建立，反而會使其領導者為了鞏固共產主義道路，進一步地選擇剷除國內的反對改革派。由於中國的社經條件與西方先進國家，甚至和亞洲新興民主國家間存有差距，且真正經濟發展的時間尚不夠長，經濟發展促進民主化的有利因素，仍有待長期持續地觀察。^⑦另外，中國從未被美國佔領過，亦未曾是美國的殖民地，基督教的號召力非常薄弱，更何況目前天主教會的力量幾乎不存在，但值得關切的宗教問題，或許是法輪功事件的後續發展。儘管儒家社會中傳統文化的成分會維持下去，而匯入中國的西方民主思想將可能與前一代或兩代人間產生變化，但是當中國要在追求經濟成長和防止發展過程中出現紊亂之間取得平衡時，奉行威權主義仍是現階段不可或缺的指導原則。^⑧

(二) 就外來勢力的新政策與示範效應方面

即使美國致力於民主制度的宣揚與推廣可以促進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但影響其他國家的民主發展仍是有限度的。對於維持獨裁政權的中國而言，強烈抨擊美國此舉為干涉內政的行為，並視其為帝國霸權主義的侵略。故目前看來中國似乎對西方國家的民主不感興趣，美國政策對其的影響與壓力並不明顯。然而雖然現成的證據不足，但

註⑤ 同註④，p. 59, p. 76, pp. 79~106, p. 310。

註⑥ 所以有學者指出，此一研究的價值在於他對第三波的描述，而不在於其所提出的解釋。參見 Landman, *op. cit.*, pp. 14~15, 146~147。吾人認為：這種研究方式雖然不如量化研究具備科學的客觀性，但比較歷史研究途徑或許較具有宏觀的視野。參考李西潭、張孝評，前引文，頁 78。

註⑦ 參見戴東清，「民主化因素與中國大陸民主化前景」，*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 11 卷第 2 期（民國 92 年 12 月），頁 138。

註⑧ 有學者認為：中國大陸二十年來經濟改革的成就，一方面固然為市民社會挹注新的活力，成為推動政治改革的主要動力，但同時卻削弱統治集團進行政治改革的決心。預料十六大在政改方面，恐怕難有驚人之舉。因為政改的目的不在推行西方式的分權和民主，而在幫助化解體制改革所淤積的張力；現階段重大的政治改革不可能搬上議程，中共仍無意調整一黨專政的統治型態。趙建民，「中共權力移轉與未來的政治民主化問題」，*東亞自由化、民主化與區域和平：中國民運民主台灣之旅紀實*（台北：唐山，民國 92 年），頁 187~192。

一九八六年菲律賓總統馬可仕垮台與南韓樞機主教 Kim Sou-hwan 追求民主的例子，造成亞洲威權領袖與反對派民主人士的焦慮和鼓舞，並對於中國在一九八六年底的自由民主學潮多少有著示範作用。^②再者，中國一黨專政的統治方式，和周邊香港的自由及台灣的民主化形成強烈鮮明的對比。而香港、台灣與其他自由民主國家（如日、韓）的政治文化對中國的侵襲勢必會造成局部擴散的效應。^③但是未來鄰近中國的自由地區或民主國家能否會「完全地」發揮其示範效果，短時間內似乎很難有證據加以驗明。^④

（三）就合法性危機方面

中國共產黨一直高揚無產階級專政，並鄙視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為資產階級式民主，其極權政體的意識形態中沒有一定非民主不可的要素，以黨領政乃是在其憲法中明白規定的。故中國若要進行民主化首需打破其一貫堅持的一黨專政路線。然而，當中共領導人在遇到統治權威衰落、受人民質疑或政績出現困局時，除了拒絕承認他們合法性受到削弱外，並對內外採取一貫的殘酷高壓與強制服從手段，來解決日益低落的威信而生存下來，且通常在政權的領導階層有更迭時發生。例如：一九八九年發生的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⑤所以，中國政權的領導核心相信就此一模式繼續達成共識，也許會有效地延緩其日漸式微的統治合法性所造成的嚴重失控後果。換言之，當統治階層能有效全面地控制其社會與人民，即使中國內部發生政權危機，也恐難有機會導發其進行民主制度的建立。

註② 一九八六年二月，繼 Jaime Sin 樞機主教在菲律賓政權更替中扮演積極角色之後的一個月，同樣地，在南韓民衆要求民主運動的關鍵時刻中，Kim 主教亦明確地贊成憲法改革的必要性，並說道：「我們必須在韓國立即實行民主政治。」參閱 *New York Times*, 10 March, 1986, p. A3。此外，到了七〇年代末，中國人對探知西方民主自由信息的渴望比其他任何時候都激烈，總覺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故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全國各大高等院校通過各種管道獲得海外有關追求「民主自由」方面的文章，對「民主自由」思想的傳播發生重要推動作用。在大學校園裡，學生喊出「民主萬歲」、「人權萬歲」、「自由萬歲」的口號，要求中共政治民主化的呼聲高漲。最後，在鄧小平政府的鎮壓學運，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等被革除黨籍，以及胡耀邦下台而落幕。參見博訊新聞網，〈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2/05/200205_030023.shtml〉。

註③ 參見趙建民，前引文，頁 192。

註④ 台灣民主化的結果在長期執政的國民黨於失去政權時，無形中使得中國共產黨缺乏推動民主化的動力。因為民主化會造成台灣經濟成長的下降與失去政權的危險，故中國對於台灣民主化的成就，並不如預期想像中的美好。參見 Bruce J. Dickson,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A Model for the PRC," *PacNet Newsletter*, Vol. 43 (October 2000), pp. 2~3.

註⑤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被中共保守派指為「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後來成為引發北京天安門前學生要求民主聲浪的導火線，並演變成全國性大規模的抗議事件。中共高層就如何保持政局，以及該如何處理這場運動，產生嚴重的分歧與鬥爭。其結果是，以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為首主張對話的主和派失勢，主張鎮壓的強硬派出動軍隊，並真槍實彈地平息這場追求民主的運動。參見「BBC News—中共 80 年大事記」，〈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1409000/14095511.htm〉。

二、台灣模式的借鏡

探究未來中國是否可能進行民主化，許多學者關注的焦點之一乃是台灣民主轉型的典範模式能否提供彼岸參考與借鑑？吾人擬從三方面提出分析：

(一) 黨國體制與性質

在第三波民主化走向民主政治的政權中通常可區分為三種威權體制的類型：一黨制、軍事體制和個人獨裁政權。其中，台灣被歸類為一黨制的威權政體。^⑥台灣在國民黨統治之下，黨機構控制各級政府的行政單位，黨組織透過政工系統控制軍隊，黨細胞滲透入現存唯一且排他的社會組織中，「反對黨」也已被迫轉變成執政黨的友黨，但是國民黨為表示政權的正當性與維持美國關係，不得不改造變成形式上「民主憲政」的政黨國家。再者，台灣國民黨這種「準列寧主義黨國體制」，與中國共產黨「列寧主義黨國體制」的「全面控制」性質不同。^⑦因為國民黨並不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原則，以及由黨長期壟斷政治權力，其意識型態堅持訓政時期之後即過渡到民主階段，並以實現民主為目標，統治作用有一定的範圍與限制；反之，共產黨除了由政黨意識型態完全決定國家的性質與目的外，並堅定地將反對共產主義的民主派，視同為對國家之不忠和背叛者，其統治作用涉入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生活，並完全服膺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⑧儘管二〇〇二年中國共產黨於「十六大」決議正式允許私營企業主（資產階級）入黨，並宣示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教義派的「中共」已死，代之而起的是有「社會民主黨」或「全民黨」樣態的「新中

註⑥ 同註④，pp. 110~113.

註⑦ 鄭敦仁以「準列寧主義的政體」來形容國民黨政權的性質；若林正丈亦以「疑似列寧主義的黨國體制」來探討台灣的民主化歷程。參見Tun-Jen Cheng,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Vol. 41, No. 4 (July 1989), pp. 471~499; 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月旦，民國83年），頁32~35、81~146; 李酉潭，「從民主化相關概念探討台灣民主轉型的歷程—兼論孫中山建國三程序的意義與作用」，頁173~174。另外，台灣國民黨這種「準列寧主義的黨國體制」，與蘇聯或中國共產黨的列寧主義體制「全面控制」性質至少有三點主要的差異：（一）以實現民主為目標：國民黨並不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原則，也不主張由黨來長期壟斷政治權力。打從開始，國民黨的意識型態即堅持訓政時期之後即過渡到民主階段；（二）地方性競爭的選舉：國民黨政權允許並策劃次於全國性的政治競爭；（三）擁有私有財產的資本主義：國民黨提倡以私有財產與廣泛市場交易為依據的資本主義經濟。參考 Tun-Jen Cheng and Stephan Haggard, "Taiwan in Transi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 No. 2 (April 1990), pp. 64~65; Tun-Jen Cheng and Stephan Haggard, "Regime Transformation in Taiwan: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Tun-Jen Cheng and Stephan Haggard,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2), pp. 6~7.

註⑧ 中共最高領導人江澤民於北京人民日報重申：我們要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決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並強調推進政治體制的改革，須從中國國情出發，堅持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發展。參閱*中國時報*，民國91年6月3日，版11。

共」。⑯但此項標誌意味著：只是突顯出中國共產黨急欲解除其統治合法性危機的技倆，長期一黨獨裁專政的體質似乎儼然不變，且不容許外界有任何絲毫的挑戰。

(二) 地方自治與選舉

在台灣雖然沒有民主經驗，卻有長期的地方選舉經驗。這種地方自治與定期舉行的地方選舉，加速了一九八〇年代以後民主化的進行，也奠下了趨向民主化的堅實基礎。⑰雖然擁有長期的地方自治經驗，意味著只有地方層次的選舉；但不容否認地，持續性的舉行選舉有利於選舉功能制度化，同時提供反對黨茁壯的機會，活絡公民社會，最後不僅有助於民主的轉型，且愈趨於自由的選舉制度才能合理運行。當選民漸漸適應並積極參與選舉過程，選舉將是政權合理性最重要的來源，同時亦成為實現民主政治的利器。故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早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就允許地方性的政治競爭，但充其量僅是對政權統治正當性的強化；在美麗島事件發生後，不少受刑人以高票當選為中央民意代表，才使執政者有機會思考政治民主化的問題。於是在蔣經國總統任內實施解除戒嚴、黨禁與報禁等自由化的改革，李登輝總統任內更逐步策劃透過定期、公開、公平與自由的全國性大選，讓人民直接選擇統治者；⑱反之，中國共產黨僅在鄉村地區試行實驗性的草根自治，選舉亦只在少數地方進行，村里選舉僅僅是形式上的、有限的，往往受到縣級官員的壓力才趕辦，更別遑論主動辦理中央級的選舉。⑲由於缺乏長期的地方自治經驗以及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機制之結果，使得中共領

註⑯ 二〇〇〇年二月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南下廣東考察，首次提出「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三個代表」論述。隨後又多次強調「三個代表」是「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二〇〇一年七月中共建黨八十週年江澤民的「七一講話」，進一步闡述「三個代表」思想內涵，表示將加強並改進共黨建設，同時主張開放私營企業主等六類符合條件者允許入黨，以擴大共產黨的社會基礎。參見姜新立，「評中共『十六大』」，中共十六大之後內部暨國際環境評估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民國91年），頁1~9。

註⑰ 田弘茂，「台灣民主鞏固的展望」，**新興民主的機遇與挑戰**（台北：業強，民國86年），頁266~268。然而，「選舉」作為一種政治機制是否在既有的政治體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台灣在日據時代就有地方選舉：一九三五年日本總督府進行台灣地方制度改革，首次實施市會議員、街庄協議員半數民選。國民黨政府遷台以後，地方選舉不僅繼續，而且規模擴大。日本殖民政府及國民黨政權的例證都顯示，開放地方基層選舉，除了統治階層能夠獨占中央政治舞台外，並迫使地方菁英在此制度性基礎上競爭，持續地方政治勢力的派系化。參考陳明通，「基層選舉、地方派系與外來政權的生存發展模式」，**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台北：月旦，民國87年），頁7~13；徐斯儉，「台灣經驗與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東亞自由化、民主化與區域和平：中國民運民主台灣之旅紀實**（台北：唐山，民國92年），頁92~93。

註⑱ 若林正丈，前揭書，頁125~126，179~182，201~204。

註⑲ 參見裴敏欣，「匍匐前行的中國民主化」，**新興民主的機遇與挑戰**（台北：業強，民國86年），頁386~394；邱澤奇，「制度性因素與中國政治民主發展」，**兩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台北：月旦，民國88年），頁291~293。此外，中國大陸的「村民自治」雖然實行十餘年，但仍未完全上軌道，其主因是中共不容許民主政治在基層發酵而往上發展；儘管中共將村民自治作為政治民主的櫥窗，並大肆對外宣傳，以大陸內部直接的選舉至今尚未到達鄉、鎮長的階段觀之，要實現政治體制的全面改革，可能是相當艱辛而漫長的路程。邱榮華，「大陸『村民委員會』制度與問題之研究」，**展望與探索**，第1卷第2期（民國92年2月），頁107~115。

導人永遠無法清楚明白自由民主的價值，於是從毛澤東到江澤民，歷任統治者都還不願去認真思考政治民主化的意義。^⑦

(三) 經濟發展與政治領導

Huntington 在**第三波**一書的結尾中指出：「經濟發展使得民主成為可能；政治領導使得民主成為真實。」^⑧對於未來的民主國家而言，政治菁英最低限度必須相信民主體制是最不壞（the least worst）的政府型態。而政治領袖之所以造就民主是因為其相信民主本身是一個目的，並視民主是實現其他目標的手段或副產品。關於台灣的經濟發展，由於出口導向的工業化造成先進工業國的經濟衝擊；後來又克服第二次石油危機、世界不景氣、龐大外債積累等困境而繼續成長。^⑨其結果是造就台灣高度經濟成長的機制，不但外國學者讚譽為「台灣經濟奇蹟」，而且國民黨當局亦宣揚「台灣經驗」可以作為包括中國在內的開發中國家模範。因此，當時台灣最高權力領導者，為了因應外在危機（退出聯合國、與美國斷交）和強化人民對台灣信心的政治目的，進行大規模的公共建設與重化工業的投資，因為經濟發展已經達到要求擴大政治參與的臨界點，而迫使開始思考如何的自由民主化；反之，中國共產黨早期實行公有財產的社會主義，為因應軍事地緣戰略時代轉變成為經貿全球戰略時代的來臨，迫使其轉向世界逐步開放其內陸市場，未來經濟發展看來似乎一片榮景；但是高度的經濟成長率，卻造成極端的不穩定壓力和緊張，加重了不平等和挫折感，並促使中國內部社會團體要求政治制度的改革，這將會是中共領導人所必需面對的考驗。^⑩假使經濟發展能夠順利成功，依據上述 Huntington 的觀點，中國未來是否民主化的關鍵將取決於「政治領導」。

綜上所陳，循著Huntington分析國家如何走向民主的看法，吾人認為中國即使願意向世界開放其經濟市場，卻又繼續維持一個封閉的政治體系，將會面臨著難以解決的矛盾與衝突。雖然台灣現在已經成為第三波民主轉型的典範，期待能以「一個自由與民主的制度」垂範中國的民主化，並對中國的新領導人有所啓示，儘早開啓中國的政治改革與民主契機；^⑪但只要中國威權專制的意識型態不改，也僅能持續地給予其

註⑦ 二〇〇二年十月十七日一場由遠景基金會所舉辦的名為「中國大陸政治形勢與十六大之觀察預測」座談會中，與談的學者認為：中國大陸的政改範圍侷限在基層民主和黨內民主方面。基層民主可能向城市居民委員會選舉發展，向上發展的可能性不高。黨內民主則首重「民主推薦」與「幹部任期制」的完善。欲知進一步相關資料內容，請參閱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網站，<<http://www.future-china.org.tw/csi/pf/activity/mt911017.htm>>。吾人懷疑中共的黨內民主能否實現，即使實現了也不一定保證能帶來全國政治體系的民主化。

註⑧ 同註④，p. 316。

註⑨ 同註①，頁 148~153。

註⑩ 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並非沒有隱憂，經濟改革面臨更深層的體制性改革。隨著經濟的快速成長，留存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諸如：缺乏公正的法治制度保障、官僚機構貪污腐敗、缺乏公平競爭與行政效率等，經濟活動在短期內無法提供市場與社會良好的制度環境。參見錢穎一，「中國市場化過度的制度基礎」，中國走向（中國：浙江人民，民國 89 年），頁 166~198。

註⑪ 參見李登輝，「盼自由民主制度垂範中國」，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台北：群策會，民國 92 年），頁 400。

自由民主的有限影響與等待。因為到目前為止中國領導階層的任何改革措施（不論是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其真正目的還是脫離不了如何維持與確保其共產黨專制獨裁的執政地位；當快速的經濟發展造成中國社會各界、中產階級、學生提出政治改造和民主要求時，中國當局卻以粗暴的方式鎮壓在北京或各地區的示威抗議活動。由此可見，中國民主化的曙光似乎尚不明顯。^⑥此外，對於中國知識份子而言，其國內所面臨的政治改革問題並非民主化要或不要進行的問題，而是試想當中國在追求民主化的過程中，如何防範避免民主化所可能帶來的各種負面的影響。對於中國學者而言，民主是可欲的，但是民主化卻充滿著風險。^⑦所以，即使中國在未來幸運的走向民主化，未必意味著其新興的民主政體就能順利開展；倘若中國在民主化過程中發生民主倒退的現象，亦恐將會導致區域戰爭發生的可能性。^⑧畢竟中國的民主化，絕非能一步登天，而是一條充滿險阻、崎嶇與迂迴的道路。

陸、台海和平的展望—代結論

當代全球化下所面臨最深遠、也最鼓舞人心的影響之一便是民主化浪潮；民主化問題亦是政治學中的一個熱門研究領域。然而民主化研究尚需要有社會科學、哲學、歷史等學門的協助，以及多樣化的理論與經驗方法。^⑨相關全球化理論和概念仍具有相當程度的模糊性，目前尚無一致公認的定義與說法。儘管以全球化標準來作為衡量民主制度的準則尚不盡理想，但全球化多少有助於民主化的推行，而全球化對於是否挑戰一國民主程度仍舊是有爭論的議題。^⑩所以，試著從全球化下的民主化浪潮出發，

註⑥ Larry Diamond在探討「第四波民主化的可能性」時曾特別表示：中共領導人企圖為了維護其獨裁統治的優勢，將會面臨許多的困境與挑戰，諸如：持續政治性改革、導入多元化參與競爭、資訊自由化、擴大團體自主空間、獨立的司法制度等問題。當這些新制度實行的範圍遍及全中國時，可能提高人民對於民主政治的盼望，甚至要求民主程序和實踐更加進一步地擴展（香港與台灣都有相似的情形發生）。倘若中國在未來二十年內能夠經歷實質的政治自由化，且達到「選舉的民主」國家水準，才有機會開啓第四波全球民主化的浪潮。參見 Larry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M. 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66~267.

註⑦ 參考徐斯儉，前引文，頁84。

註⑧ 說來弔詭，亞太國家為保障區域和平而必須促使中國的民主化，但在中國趨向民主化的過程中，中國對亞太地區的安全與和平的威脅卻可能升到最高點。參見謝秉憲，「中國民主化與東亞區域和平的未來」，*東亞自由化、民主化與區域和平：中國民運民主台灣之旅紀實*（台北：唐山，民國92年），頁239。

註⑨ 舉凡科學的研究，都是由制定概念進而成立陳述，再依據陳述而建構通則、定律或原理的一種有系統、有方法的價值活動。然而政治學研究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一環，在概念的釐清與界定上，仍舊存有許多涵義的分歧，且尚停留在相對落後的狀態中。參見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民國82年），頁29，42~47。

註⑩ 欲檢驗民主與全球化的關係，可以藉由民主兩方面的基本差異，（一）視民主為一個程序，亦即經由自由公正的選舉，以確保政府合理穩定的轉換；（二）視民主為一種文化，亦即經由內化評價的準則，以確保個人他人所屬的利益。顯然全球化無疑地提高民主程序的效率，但並不保證民主文化的發展；甚至可以說全球化會增強民主是一必經程序的說法，卻減弱民主成爲一種文化的觀點。參考Zaki Laidi, "Democracy in Real Tim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3, No. 3 (July 2002), pp. 68~69.

設想未來兩岸關係的遠景是和平乎？抑或戰爭乎？分別就兩方面來加以評析：

一、目前台灣不但被正式列入自由民主的國家，而且成功地由威權政體轉變成爲民主體制，象徵著已經走在二十一世紀世界思潮的主流和自由、民主、人權普世價值的道路，基本上符合民主體制可能會向不具正當性的侵略國家開戰，但民主政治的文化卻難以與同樣立基於民主正當性的體制開戰的原則。換言之，雖然無法推論未來民主國家間一定不會發生戰爭，然似乎可以說未來民主國家之間比較不會發生戰爭。民主與和平間的確有著相輔相成的作用，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民主國家間較少發生戰爭」。^⑧未來的台灣除非面臨「民主的腐蝕」或「民主的崩潰」情況，^⑨否則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的機率幾乎等於零。也就是說：穩定且鞏固的民主國家不會攻擊他國，但民主化過程中遇到挫敗時或民主脆弱時，將不適用之。

二、反觀中國，依前述「自由之家」判別自由民主國家的標準來看，其政權不具備由自由選舉所提供的正當性，且經常會訴諸威脅和暴力來壓制國內的不同意見，並傾向排斥新聞自由與司法獨立的制度，以求達到操縱人民而恣意妄爲，不但造成鄰國強烈感到緊張的氣氛，並使得東亞地區戰爭發生的不安和恐懼感與日俱增。中國迄今仍舊被評定爲基本政治權利缺乏及基本公民自由遭到剝奪的不自由國家，且尚未有任何民主化的進行。^⑩未來中國若真正開始啓動民主化，則民主化過程將會帶來其國內的不穩定與權力鬥爭，加深其對外發動戰爭的可能性，因爲政治體制的變遷與族群意識的動員，似乎會伴隨著戰爭可能性的增加。

最後，關於海峽兩岸和平的展望，一方面在於台灣維持自由民主體制並順利地邁向民主鞏固的目標，避免民主倒退甚至於民主崩潰；另一方面則繫於中國未來民主化能順利啓動，並在國際社會的協助下，穩定和平地進行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的歷程，最終成爲自由民主的國家。顯然，在中國民主化成熟之前，兩岸戰爭的危機勢必存有一

註⑧ 畢竟民主國家和平的主要原因是國家內的人民擁有自由地批評其政府的權利，任何的行動皆須尊重民意，並且不會以武力作爲要脅他國就範的唯一手段，必須盡全力尋找和平解決紛爭的方法，即使最後決意開啓戰事，亦須考慮經過國內民意機構的監督同意，是否獲得國際法規慣例的支持，並進行國與國之間的外交斡旋等調解方式。參見 Sorense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pp. 97~101.

註⑨ Schedler 特別在討論「民主鞏固的各種概念」時，提出四種層次的分類法—威權主義、選舉的民主、自由的民主與先進的民主，民主鞏固的目標是爲了達成「先進民主」的積極水平，而防免它倒退或崩壞爲「威權政體」的消極水平，其理論相當符合西方民主國家民主化的歷程。他並指出五種民主鞏固的概念：(一) 防止民主崩潰、(二) 防止民主腐蝕、(三) 完成民主、(四) 深化民主、(五) 組織民主。參見 Schedler, *op. cit.*, pp. 93~105; 並參考李酉潭，「邁向先進的民主：二十一世紀台灣民主化的展望」，「跨世紀的政治願景」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東海大學，民國 88 年 12 月 17~18 日），頁 48~50，以及李酉潭，「民主鞏固概念的爭議」，頁 7~9。民主鞏固的消極概念是關心民主穩定並避免倒退，積極概念則關心民主進展並提升品質。

註⑩ 因爲中國一直停留在不自由國家之列：一九七二~二〇〇二年間的「政治權利」不是靜止在第六等級，就是下降至最後的第七等級；「公民自由」除了僅一九七九年列爲第五等級外，其它則是在第六、七等級上下起伏不定，而自由等級自始至終皆處在不自由的狀態。參考李酉潭，「邁向先進的民主：二十一世紀台灣民主化的展望」，頁 54~56。

段漫長的觀察期，台灣必須持續密切關注、審慎因應並智慧處理。誠如有學者指出：當代中國民主化很可能發生在急遽擴張與西方的經濟關係時，西方商業夥伴與安全的穩定存在很可能扮演型塑贊成民主聯合誘因的角色。長期而言，穩定民主版圖的擴張可能增加和平的展望；但短期來說，國際社會仍要做許多工作以減少中國動盪轉型的危險。^⑥中國是否可能在經濟快速發展以後，在可預見的將來啟動所謂第四波的民主化運動，正考驗著全體中國人的智慧。^⑦目前台灣的民主政治只通過衡量鞏固程度「兩次輪替測試」中的第一次政黨輪替，尚不能與歐美先進的民主國家相提並論，故真正民主鞏固的階段並未完成。對於許多西方國家而言，台灣愈是自由民主，民主化程度愈深，將更能凸顯中國打算使用武力解決台海問題的手段是完全不合時宜的。對於台灣是否選擇與對岸統一，不能由美國或中共片面主導，而應該尊重台灣二千三百萬人的自由意志。更何況若要選擇統一，也唯有在自由民主制度之下，台灣人民的自由、人權與和平才能獲得確保。^⑧畢竟，中國未來的政局動盪和民主轉型與否，台灣終究無法避免其影響。國際社會亦須對於中國的政局變遷持續給予關注與幫助，唯有中國成為自由民主國家，才能有助於東亞區域與世界的安全；也唯有民主化的順利推展，才能確保台海兩岸未來情勢的永久穩定與和平。^⑨

* * *

（收件：92年7月22日，修正：92年11月4日，接受：93年5月1日）

註⑥ Mansfield and Snyder,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anger of War," p. 38.

註⑦ 民主期刊，二〇〇三年一月刊載的論文指出：統計數據顯示一個基本的常規—自由開放的社會其經濟生產力的擴張，較封閉威權的社會要來得快，但中國卻是罕見例外的個案。參見 Karatnycky, "The 30th Anniversary Freedom House Survey," p. 113. 無怪乎此期刊編者在為探討中國的九篇論文作序言時下了一個註解：中國政治未來五年內將更加不清楚。

註⑧ 吾人要特別指出，民主理論大師 Dahl 認為，有利於民主的關鍵性條件還包含：不存在強大的敵視民主的外部勢力。台灣民主鞏固的獨特性挑戰無法否認地來自中國「一國兩制」統一的壓力，如果我們無法鞏固民主、捍衛自由、維護人權，更遑論期待「透過民主化培養民主的文化，運用民主的機制解決民主的問題」。參見：李西潭，「新興民主國家的問題及其解決」，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政策論壇電子報，第50號（民國92年1月17日），〈http://www.socialsciences.nccu.edu.tw/society/composition/030117/pol_g_030117_c.htm〉。

註⑨ 有學者研究認為：台灣國家認同問題尚待解決，涉及的乃是國內的政治兩極化與外來的干涉。而台灣民主化的困境乃是（一）民主化增加台灣國際合法性；（二）民主化增加中共侵犯的可能。參見 Chu, "Taiwan's Unique Challenges," pp. 71, 80.

Democratization and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Yeau-Tarn Lee

Associate Professor, Sun Yat-sen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siao-Ping Chang

Master of Art, Sun Yat-sen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ost striking global phenomenon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was the rapid spread of “third-wave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new democracies as a result. After having held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s, Taiwan has been regarded as a democratic country and praised as a paradigm for democratic transition. At present, whether democratization will take place in China attracted global attention because it has been known in social sciences that democratic nations don't fight each other, although unstable, staggering transition may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war. Given that, only when China embarks on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in the fourth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will we see the light for lasting global peac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globalization and to clarify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democratization, war and peace. In the meantime, the article analyzes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s well as the possibility of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gives some though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Democratization; Democratic Transitio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Peace



參考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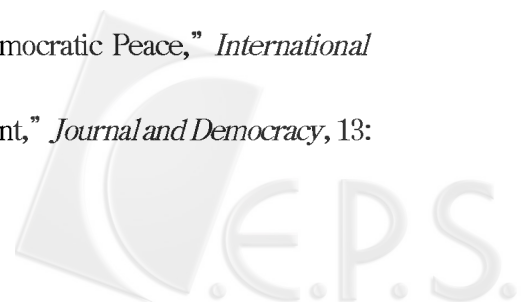
- 田弘茂（1997），「台灣民主鞏固的展望」，田弘茂等（主編），《新興民主的機遇與挑戰》，244-291，台北：業強。
- 江炳倫、吳文程（1992），「國民黨政治角色的轉變」，張京育（主編），《中華民國民主化—過程、制度與影響》，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21-148。
- 李酉潭（1997），「從民主化相關概念探討台灣民主轉型的歷程—兼論孫中山建國三程序的意義與作用」，《政治學報》，29，141-92。
- 李酉潭（1997），「邁向鞏固的民主：台灣案例」，《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5：2，161-196。
- 李酉潭（1999），「邁向先進的民主：二十一世紀台灣民主化的展望」，《「跨世紀的政治願景」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東海大學，43-65。
- 李酉潭（2002），「民主鞏固概念的爭議」，台灣政治學會 2002 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政治學會，1-26。
- 李酉潭、張孝評（2002），「台灣民主化分析 Rustow 與 Huntington 模式的檢驗」，《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10：2，45-87。
- 李登輝（2003），「盼自由民主制度垂範中國」，群策會，《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台北縣淡水鎮：群策會，397-400。
- 阮銘（2000），《民主在台灣》，台北：源流。
- 阮銘（2001），《民主台灣 vs. 共產中國》，台北：玉山。
- 易君博（1993），《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
- 邱榮華（2003），「大陸『村民委員會』制度與問題之研究」，《展望與探索》，1：2，107-115。
- 邱澤奇（1999），「制度性因素與中國政治民主發展」，林佳龍、邱澤奇（主編），《兩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台北：月旦，285-326。
- 姜新立（2002），「評中共『十六大』」，《中共十六大之後內部暨國際環境評估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1-9。
- 若林正丈（1994），《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洪金珠、許佩賢（譯），台北：月旦。
- 倪炎元（1995），《東亞威權政權之轉型：比較台灣與南韓的民主化歷程》，台北：月旦。
- 徐斯儉（2003），「台灣經驗與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曾建元（主編），《東亞自由化、民主化與區域和平：中國民運民主台灣之旅紀實》，台北：唐山，83-96。
- 陳明通（1998），「基層選舉、地方派系與外來政權的生存發展模式」，陳明通、鄭永年（主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台北：月旦，3-22。

- 陳義彥、陳陸輝（2002），「政治功效意識、政治信任感以及台灣選民的民主價值」，
《2001年選舉與民主調查研究研討會》，台北：「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規劃與推
動委員會，1-30。
- 裴敏欣（1997），「匍匐前行的中國民主化」，田弘茂等(主編)，《新興民主的機遇
與挑戰》，台北：業強，374-398。
- 趙建民（2003），「中共權力移轉與未來的政治民主化問題」，曾建元(主編)，《東
亞自由化、民主化與區域和平：中國民運民主台灣之旅紀實》，台北：唐山，
183-192。
- 蔡玲、馬若孟著，羅珞珈譯，（1998），《中國第一個民主體系》，台北：三民。
- 鄭曉時（1997），「我國政軍關係的變遷趨勢：1987~1995」，蘇進強等，《軍隊與
社會》，台北：業強，87-100。
- 錢穎一（2000），「中國市場化過度的制度基礎」，胡鞍綱(主編)，《中國走向》，
中國：浙江人民，166-198。
- 戴東清（2003），「民主化因素與中國大陸民主化前景」，《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
刊》，11：2，123-158。
- 謝秉憲（2003），「中國民主化與東亞區域和平的未來」，曾建元(主編)，《東亞自
由化、民主化與區域和平：中國民運民主台灣之旅紀實》，台北：唐山，
225-240。
- Carothers, Thomas (2002),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
cracy*, 13: 1, 5-21.
- Chan, Steve (1984),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Are the Freer Countries More Paci-
fic?"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8: 4, 617-648.
- Cheng, Tun-Jen (1989),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41: 4, 471-499.
- Cheng, Tun-Jen and Stephan Haggard (1990), "Taiwan in Transi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1: 2, 64-65.
- Cheng, Tun-Jen and Stephan Haggard (1992), "Regime Transformation in Taiwan: The-
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Tun-Jen Cheng and Stephan Haggard
(eds.),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29.
- Chu, Yun-han (1996), "Taiwan's Unique Challenges," *Journal of Democracy*, 7: 3, 69-82.
- Chu, Yun-han, Larry Diamond and Doh C. Shin (2001), "Halting Progress in Korea and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12: 1, 123-136.
- Clarke, Paul Barry and Joe Foweraker (eds.) (2001), *Encyclopedia of Democratic
Though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Copper, John F. (1994), *Taiwan's 1991 and 1992 Non-Supplemental Elections: Reaching a
Higher State of Democracy*, Lanham, M. 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Cotton, James (1997), "East Asian Democracy: Progress and Limits," in Larry Diamond, Marc F. Plattner, Yun-han Chu, and Hung-mao Tien,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Regional Challenges*, Baltimore, M. 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95-119.
- Crescenzi, Mark J. C. and Andrew J. Enterline (1999), "Ripples from the Waves? A Systemic, Time-Series Analysis of Democracy, Democratization, and Interstate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6: 1, 75-94.
- Diamond, Larry (1996), "Is The Third Wave Over?" *Journal of Democracy*, 7: 3, 20-37.
- (1999),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M. 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2000), "The End of the Third Wave and the Start of the Fourth," in Marc F. Plattner and Joao Carlos Espada (eds.), *The Democratic Invention*,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3-33.
- Dickson, Bruce J. (2000),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A Model for the PRC," *PacNet Newsletter*, 43, 1-7.
- Doyle, Michael W. (1986),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4, 1151-1169.
- Gastil, Raymond D. (ed.) (1989), *Freedom in the World: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1988-89*, New York: Freedom House.
- Gleditsch, Nils P. and Havard Herge (1997), "Peace and Democrac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1: 2, 283-310.
- Held, David (1996), *Model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eld, David, A. McGrew, D. Glodblatt, and J. Perraton (1999),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Oxford: Polity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Olk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1997), "After Twenty Years: The Future of the Third Wave," *Journal of Democracy*, 8: 4, 3-12.
- (1997), "Freedom on the March," *Freedom Review*, 28: 1, 5-29.
- (1997), *Freedom in the World: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New York: Freedom House, 475-477.
- (1998), *Freedom in the World: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New York: Freedom House, 487-489.
- (1999), *Freedom in the World: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New York: Freedom House, 443-446.
- (2000), *Freedom in the World: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New York: Freedom House, 468-470.



- (2001), *Freedom in the World: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New York: Freedom House, 521-524.
- (2002), “Muslim Countries and the Democracy Gap,” *Journal of Democracy*, 13: 1, 99-112.
- (2003), “The 30th Anniversary Freedom House Survey: Liberty’s Advances in a Troubled World,” *Journal of Democracy*, 14: 1, 100-113.
- (2004), “The 2003 Freedom House Survey: National Income and Liberty,” *Journal of Democracy*, 15: 1, 82-93.
- Karl, T. L. (1990), “Dilemmas of 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23: 1, 1-21.
- Laidi, Zaki (2002), “Democracy in Real Time,” *Journal of Democracy*, 13: 3, 68-79.
- Landman, Todd (2000), *Issues and Method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Levine, D. (1988), “Paradigm Lost: Dependency to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40: 3, 377-394.
- Linz, Juan J. and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M. 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Mainwaring, Scott (1992),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Issues,” in Scott Mainwaring, Guillermo O’Donnell and J. Samuel Valenzuela (eds.), *Issues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94-341.
- Mansfield, Edward D. and Jack Snyder (1995),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anger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 1, 5-38.
- Mansfield, Edward D. and Jack Snyder (2002), “Democratic Transitions, Institutional Strength an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6: 2, 297-337.
- Maoz, Z. and B. Russett (1993), “Normative and Structural Causes of Democratic Peace, 1946-198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 3, 624-638.
- Monshipouri, Mahmood (1995), *Democratization Liberalization & Human Rights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O’Donnell, Guillermo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M. 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Owen, John M. (1994), “How Liberalism Produces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2, 87-125.
- Plattner, Marc F. (2002), “Globalization and Self-Government,” *Journal and Democracy*, 13: 3, 54-67.



- Potter, David, David Goldblatt, Margaret Kiloh and Paul Lewis (1997), *Democratization*, Cambridge: The Open University.
- Przeworski, A. (1991),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aknerud, A. and H. Herge (1997), "The Hazard of War: Reassessing the Evidence for the Democratic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4: 4, 385-404.
- Ress, Hans (ed.) (1970), *Kant's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ot, Hilton L. (2002), "What Democracy Can Do for East Asia," *Journal of Democracy*, 13: 1, 113-126.
- Rustow, Dankwart A. (1970),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Comparative Politics*, 2: 3, 337-363.
- Schedler, Andreas (1998), "What i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9: 2, 91-107.
- Schumpeter, Joseph A. (1976),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Small, Melvin and J. David Singer (1976), "The War-Proneness of Democratic Regimes," *The Jerusale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 4, 50-69.
- Smolar, Aleksander (2001), "History and Memory: The Revolution of 1989~91," *Journal of Democracy*, 12: 1, 30-42
- Sorensen, Georg (1998),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Processes and Prospects in a Changing World*. 2nd ed, Oxford: Westview Press.
- Thompson, W and R. Tucker (1997), "A Tale of Two Democratic Peace Critiqu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1: 3, 428-454.
- Ward, Michael D. and Kristian S. Gleditsch (1998), "Democratizing for Pea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 1, 51-61.